

燃烧的岁月

燃烧的岁月



启创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
QI CHUANG YOUTH SOCIAL WORK SERVICE CENTER



新松友邻社工服务站

地址：龙京路北3座39号（锦绣一村内绿色小屋）
热线电话：0757-22174258 18024137277
微博：@启创-大良友邻
QQ：2644469980



感谢

大良街道社工局

新松社区居委会

对本书创作及出版的支持

序

新

松友邻社工站创作的《燃烧的岁月》一书行将付梓，为我区文学艺术百花园，增添了一朵新的奇葩。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以及四海宾朋，都可以从这幽幽墨香中，识得岁月无痕的滋味，识得岁月沧桑的艰辛。这本书的字字句句都饱含着编委们的辛勤汗水，仅《燃烧的岁月》封面就设计了几种，每一种都是一件精美的瓷器，让人难以取舍。看着《燃烧的岁月》的样书，大32开，轻型纸，彩色印刷，精美而大气，拿在手中，很有分量，打开来，一种亲切而宏大的气息扑面而来，是啊，这是这片土地特有的气息，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特有的感受。

这本书从封面到内页，无装饰，少喧哗，无名人名作序，也没有特别人推荐，就这样无华，淡雅，真实。全书分五个章节共计23篇文章，还附有图片60余幅。得知此书是由社区几名几乎没有写作经验的普通家庭妇女所作，很是惊讶。拿到初稿后，好奇心驱使我去细读每一篇作品，感觉文章选材恰当，每篇都能从生活的小事入手，感悟生活中的真善美，讲述最简单的人生道理。而且语言生活化，读来，就如同坐在长者的对面，听他们娓娓道来，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在往事里，和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与生活中的艰难困苦作斗争。

我细细品读每一篇文章，看得出每一篇文章，都凝聚了编辑人员的心血和汗水，编委们用饱含深爱的笔，深情地编撰了老人们对故乡的眷恋，对童年的追忆，对革命的向往，对工作的热情，对幸福的追求，对梦想的执着，对爱情的忠贞，对家庭的责任，对子女的关怀，对父母的奉养，对手足的惦念，对人生的思考……

翻过那些苍凉的扉页，看到的是在那艰苦的岁月中，那些人是怎么走过来的？是怎么生活的？《青少年时期的回

忆》龙源老先生里有这么一段话：“一路上，我尽量地避开鬼子的据点。走那些稍微偏僻且相对隐蔽的地方，但不会让铁路脱离自己的视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回家的路。白天一天没停地赶路，脚上也打起了血泡，从早上到晚上我粒米未进，加上赶了一天的路，又累又饿。”。合上书卷，仍感觉心潮翻滚，百感交集，泪遮双目，那样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啊；《往事难忘》那篇里武阿姨很小就上山开荒、抡铁锤砸小石头、为哥哥讨公道等等，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空军团长卢耀波》这篇文章里的卢耀波老先生，珍宝岛战役他参加过，唐山大地震他也奉命去侦察过，真是哪里需要哪里到啊；《平凡的母亲伟大的爱》反映的是梁妈妈三十年如一日，去抚养一个除了嘴能吃东西外，什么都做不了的残疾女儿，你还能轻松说是很平常吗？

这本书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为主旋律，真实地记录了长者们的人生之路，充分地反映了那时期人们的真实生活，具有很好的传承教育意义。作为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不仅要好好阅读，更要以此教育下一代，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书中所涉的主人公们，虽然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命运坎坷，但他们从未对生活感到绝望，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从未放弃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无论是处于乱世之中，还是处于炮火纷飞的年代，他们选择的都是坚持、坚强、勇敢。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这本书中的故事，让我们更深地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如今书中的主人公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在与病魔顽强地斗争，他们热爱生活，心态年轻，关爱子孙，也深受人们的尊敬。他们晚年幸福，期颐人瑞，是我们所有年轻人乃至社会的共同愿望！照顾好老人，陪好老人走过最后人生，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责任！再一次祝福书中长者们快乐安康！

李瑞谏（桂畔小学副校长）
2013年12月20日

C 目录 Contents



全体主创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陈小玲、宋焕珍、张海芳、付红霞、何忠彦、刘细霞、周美华

《燃烧的岁月》

统 筹：付红霞
总 编：何忠彦
修 订：付红霞 刘细霞
责任编辑：刘细霞 周美华 陈小玲 张海芳 宋焕珍
设 计：大良形社广告
开 本：32开
字 数：74千字
印 张：1-2000册
版 次：2014年3月第一版
印 次：2014年3月第一次印刷

第一章 退伍军人

空军团长卢耀波	03
我是一个兵	10
难忘军营	16
戍边军人冯国群	21
手枪队长绍甫	26
风云海疆	32
林兴祥的往事	37

第二章 城镇居民

青少年时期的回忆	45
中医痴人何泽礼	50
甘竹滩畔的青春	59
岁月无痕	64
贤妻	70
文革中的二三事	73

第三章 农村居民

逝去的青春	81
年轻时的点滴回忆	84
那些年那些事	88
难忘北京行	93
平凡的母亲伟大的爱	97

第四章 新来顺德居民

武阿姨的往事	103
老曹的打工岁月	108
天灾无情人有爱	113
艰苦的年代纯洁的人	119

第五章 知青

顺德知青	125
------	-----



退伍軍人



空军团长卢耀波

卢耀波口述 周美华整理

童年时代

我是193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祖籍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

也正是这个简单清白的家庭成分，让我走上了几十年的空飞生涯。

我的最大特点就是很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领导的话。1952年，记得那时自己大概有13岁，正在上小学，中国掀起“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至1953年），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扔下了大量细菌、昆虫、羽毛、腐烂的动物肢体，以及其他许多携带病菌的奇怪的物体。有人因为瘟疫、炭疽热、脑炎导致生病或迅速死亡，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对此，我国政府不但强烈抗议，还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直接目的就是粉碎敌人的细菌战，“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的口号遍布全国各地，为后来更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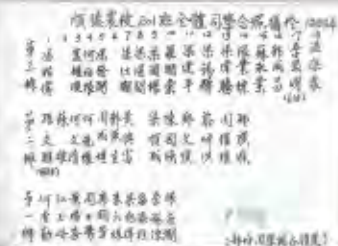
我也积极参与到这个“除四害”运动中，每天放学后想方设法去抓老鼠。交到学校去的老鼠尾巴我是最多的，因此学校授予我“捕鼠能手”的称号，我就这样出名了。

在我15岁的时候，学校看我灵活乖巧，做事积极主动，让我在一幕话剧中扮演蒋介石，我很投入演得相当成功，所以在学校的名声就更大了。我第二次又出了名，成了校园的小明星。

1958年，我到农业学校去读书，当时这所学校还没完工，农民出身的我只有半工半读，一个星期去勒流安利农场劳动，一个星期回到学校读书。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知道我唯有比别人更努力，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现状。懂事的我严格要求自己样样要达标，读书很刻苦，干活也很卖力，在当时来说，是个人人眼中的进步青年，给老师、同学、邻居等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农校毕业班留影



熔炉冶炼

1960年5月，空军部队来招飞行员，我顺利通过层层体检，内查外调时，乡亲们和老师都对我作出很高的评价，总结后就是听话、勤奋、上进。加上家族关系也很简单，四代都是以种地为生。就这样过五关，斩六将，我总算顺利过关，从此光荣入伍。这批空军整整招了2000多人，可顺德就我一个合格的。一个贫苦农民，当上了空军飞行员，多么骄傲多么激动啊！临别时，几十个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和亲属去欢送我，真是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啊……就这样一步三

回头，我随新兵部队出发了，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39760部队三大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空军战士。

到部队后，首先就是在航校学习。前3个月是文化课培训，得益于以前读过几年书，学起来就很轻松，很快就掌握了关于飞行的理论知识。然后就开始学习飞行技术。想着不久的将来我可以把自己带上蓝天了，于是每天苦练，练体能、练技术、练跳伞。第一次跳伞时觉得很新奇，不觉得害怕，眼睛一闭纵身一跃，翻了几个滚之后降落伞打开了，缓慢下降，看到其他的学员在周围飘荡，感觉很开心。第二次跳伞就很害怕很紧张了，

因为经历第一次跳伞之后，我深知在跳下去的瞬间，会有翻滚打转的动作，弄不好是很危险的。但，当时的情形是前面有人跳下去，后面有人等着跳，还紧紧地被教练逼着，不跳就会被教练踹下去，只有横下心闭着眼睛往下跳，就是这样慢慢地练就了坚强的毅力和胆魄。

由于年青上进，积极投入，学东西也特别快。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操练，我的飞行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终于可以在天空中翱翔了，记得第一次驾驶飞机在蓝天翱翔时，我的心里真有一种称霸天空的骄傲。我的飞行技术日益精湛，每年单位都会派我去参加飞行技术考核比赛，每次我都不负众望，取得很好的成绩，给单位争得了不少荣誉。飞行技术考核是相当严格的，其中有一项是考核着陆平稳性的，在飞机降落时，考官会在机舱放一杯水，一般人降落时，那杯水都会或轻微，或激烈地动荡起来，唯有我的降机是极其平稳的，我那杯水纹丝不动。由于平时训练一丝不苟，技术迅速



提高，不久，我就被部队提升为大队长。

鉴于我的空飞技术高超，办事雷厉风行，且不乏原则性。上级派给我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去航空学院选拔10名合格的空飞学员。我被任命为选拔小组的组长，随行的还有一名医生和一名参谋。到航空学院后马上就开始工作，首先是调出参选学员的档案，审查合格的参加体检，体检达标的就参加体育训练。体育训练的项目是中长跑，观察每个人跑完1500米之后的反应，气喘吁吁的不要，出汗厉害的不要，没跑完的不要。对这次工作，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三个人白天紧张工作了一天，晚上还要仔仔细细地审查档案，还要讨论一下白天的选拔情况，做到绝不出一点差错。这样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国家选出了10名优秀的空飞人才。



珍宝岛战役

中国的北方有一座小岛叫珍宝岛，面积仅有0.74平方公里，上世纪60年代末发生在这个岛上那场激烈战斗，亲历者为数不多，我是其中的一个。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当地居民祖祖辈辈在这里从事生产活动，我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1967年后，苏联边防军开始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巡逻队上岛巡逻，多次制造流血事件。对于苏军的挑衅行径，我国边防部队严格执行政府、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了极大的克制忍让，但苏联政府对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和警告置若罔闻，苏联边防军的挑衅行为毫无收敛。

1969年3月2日8时，我国边防部队派出巡逻分队登岛执行巡逻任务。苏军发现后，立即出动70多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从苏联境内分路向珍宝岛急进，接近珍宝岛后，向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进逼，他们不顾我边防巡逻分队向其发出的警告，突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边防巡逻人员6人。我边防巡逻分队被迫开始进行了自卫还击。

3月中旬，苏军想强行夺岛，我国陆军派了一个团参战，苏联的武器装备很先进。尤其是最新研制的坦克，表面呈菱形，坦克头尖两边滑。我们的炮弹击中坦克也只能被滑开，毫无杀伤力。苏联的坦克在这冰天雪地中喘着粗气，肆无忌惮地向我边防军压过来，我军沉着应战，很快想出一个办法：炸履带！随着一声令下，我军的火力全部集中到坦克的履带上面，炸履带的同时，把包裹着坚冰的江面也给炸开了很大的坑，苏军坦克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痪在那里，动弹不得，乘员弃车而逃。

为争夺坦克，双方又互对炮击，17日，苏军又出动步兵70多人，在岛上铺设地雷，企图阻止我边防部队登岛，并拖回被我军击坏滞留在江面的那辆T-62型坦克。我军以炮火将其击退，被炸坏的苏军坦克始终没有被拖回去。3月21日，苏方不愿让我们获得这个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坦克，遂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又被击退。后来苏军用炮火把坦克下的冰层击穿，坦克顿时沉入乌苏里江。4月初，军委副主席下令，挑选最好的潜水员从冰层下面接近坦克，将钢丝绳索等套在坦克上，然后将坦克拉到我方岸边并打捞出来，之后坦克被放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供人们参观，并且成为当时苏军侵略珍宝岛的证据（现岛上建有长廊小桥和市场，已成为旅游胜地和中俄民间贸易场所）。

珍宝岛战役期间，因为环境恶劣，守岛将士后勤补给匮

乏，急需要空军空投物资。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下达指示：要最好的飞机、最好的飞行员去支援珍宝岛战役。就是在这关键时刻，我抱着为祖国献身的决心，主动请缨，最后被批准去珍宝岛参加战斗的。我虽不是边防军，但我是军人，是开飞机的，我有义务去参加战斗，有义务去保卫祖国的边防。就这样，我冒着被敌军导弹打下来的危险奔赴战场。当时我怀揣一本毛主席语录，驾驶着一架直升机，主要任务就是向中国边境空投物资和接送人员。在珍宝岛上空可以清晰地看到战场及其周边环境，那时正值三月，千里冰雪，一片荒凉。我看见了在那冰天雪地，硝烟弥漫的战场，我军将士们出生入死，英勇奋战的场面；我看见了火箭筒战士在那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甩掉棉衣，先后击毁多部敌人装甲车的场面；我看见了为保卫祖国领土而英勇献身的那些年轻的英烈们的坟茔。我每天都被英雄们鼓舞着，变得更加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

三个月后，珍宝岛战役以我方的胜利而结束，我驾着飞机带着战友们凯旋而归，师部、团部的官兵都出来迎接我们。由于在珍宝岛开战之前，我就提出要结婚，当天晚上，领导就安排放我三天婚假，珍宝岛事件胜利后的第二天我就结婚了。

69年7月份，林彪去北戴河度假，我被上级安排去值班，应对突发状况。

1975年，我调到陆军航空58301部队，由于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军事素质过硬，成绩显著，荣立三等功，被授予上校军衔，担任团长（正团级）。30年空中飞行的我，安全飞行1500小时以上，近万次的起飞降落，难以计数的高难度飞行，战斗中经历生死考验。

1976年7月28日深夜，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地震发生后，通讯设施随即瘫痪，唐山及周边地区与外界中断联系。



采访证

退伍证

党中央国务院得知华北地区发生大地震，却不知道具体地点在哪里。于是，中央军委安排我驾驶第一驾飞机，前往可能事发地点进行侦查，随机的还有中央记者。飞机飞临唐山上空，俯瞰，原本应该灯火通明的城市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我判断一定是唐山发生了地震，而且根据现场的情况判断，地震的危害非常巨大，于是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党中央立即派员前去灾区救援，为救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99年12月，我从部队退伍，转业到顺德市科学技术局。这段从戎的往事，将永远停留在我记忆的深处。它不但鞭策着我，更时刻提醒我今日的一切都是如何的来之不易，好好地过好每一天，就是对我自己和那些已逝英灵的一个最好的交代。

我是一个兵

梁世荣口述 周美华整理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的心都特别激动，那些逝去的岁月，总是隐隐约约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叫梁世荣，祖籍顺德杏坛。六、七十年代，顺德农村人多地少，非常贫困，农村的孩子靠读书跳出农门的非常少，而当兵却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所以农村小伙子，到了十八、九岁都会去报名参军，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的口号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那个年代，青少年羡慕当兵，适龄青年争着当兵，能当上兵就是最风光的。1969年初冬，驻守在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2530部队，迎来了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兵，这其中就有着满脸笑容稚气十足的我，当时我才十八岁。从农村里出来的孩子看到一切都是新奇的，特别是初到北方心里特别好奇，下雪、结冰、结窗花、雾松啊等等，甚至连北方人的生活习惯也感到新奇。我非常高兴乐不可支，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然而，不久我的这种感觉就被艰辛、疲惫和思乡之情所取代了。新兵



这些年一路走来，我都庆幸自己当年选择了参军。虽然离开部队几十年了，在涉入社会的日子里，没有往日的训练，没有和战友一起同甘共苦的岁月，可内心却怎么也忘不了，那橄榄绿上曾经留下的汗水，怎么也忘不了我是一个兵。



培训真叫苦啊，摸爬滚打、越野奔袭、早出晚归等等，训练时累得腰酸腿软、骨肉僵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着实让我饱尝了个中的滋味。

七十年代初林彪掌权期间，比较注重军队的锻炼，部队经常组织拉练，每次拉练都要历时两三个月，途经数个地区比如丹东、抚顺等等。拉练期间虽然很艰苦，但也苦中有乐，也长了很多见识，至今很难忘怀。

记得有次拉练，天还没亮，嘹亮的号声就把我从梦中惊醒，赶紧手忙脚乱地穿上军装，在半睡半醒中奔出房门，背上行李和7斤大米、拿上冲锋枪（平均每人负重六、七十斤），就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拉练。一两万人的队伍，走在荒无人烟的林海雪原里。在这林海雪原深处练战术、练战法、练指挥，练过硬本领。雪没过大腿深，头上身上都是雪，简直就是个雪人。走路时抬起这条腿，那条腿就陷入雪中，行走非常困难。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每天至少要急行军五十公里，晚上在雪原深处露宿。那时真是体会了北方的林海雪原，体会了北方的漫天飞雪，体会了北方的三九严寒啊。

行军几天后，也会在老百姓家里歇两天。在老百姓家歇息时，一般五六个人住一家。当时的村民非常淳朴，



东北中朝边防线上留影



专业之后工作岗位上

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冬季的北方嘎嘎冷，外面西北风裹着大烟泡没命地往嘴里呛、往脖子里灌。屋里他们把火炉烧得正旺，使劲地往火炉里加柴火，又把最好的最暖的大火炕让我们住，真是觉得雪中送炭暖到心窝了。晚上，我们就用自带的发电机发电，为村民们放电影。村里基本上没有文化生活，所以放电影的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去看。他们站在冰天雪地的广场上，在零下四十几度的严寒里，看得津津有味。孩子们高兴得跳来跳去。当时我就感觉到了村民们对我们的感激，对我们的热爱。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村民们送别的场面特别感人，路边摆着几公里长的茶水摊。一些老百姓把自己的鸡蛋、饼、苞米等干粮往我们的怀里、手里塞。当时部队有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所以大家都不会收，但是茶水可以喝，也可以往水壶里装。

因每年都进行拉练，期间经过许多边防地区，丹东的朝鲜族同胞给我的印象最深刻。朝鲜族的家里非常干净，一尘不染。房子通常是土房子，有些家庭的地板是木地板，有些是泥土混合着锯末做的地板，所有家庭的地板都擦拭得非常干净，进门要脱鞋。泥土做成的墙壁糊上白纸，看上去家里雪白雪白的，非常好看。朝鲜同胞们都穿着民族服装，老年男女一般穿黑白两种颜色，年轻人可以不拘颜色，五颜六色都可以穿，一般粉色居多。朝鲜族妇女习惯用头部顶着东西，我多次看到她们洗完衣服后，用头顶着洗衣盆回家。有一次，看到一位中年妇女用头顶着一个硕大的木盆往回走，木盆里装满刚洗好的被单。我目测了一下，这个木盆至少有100斤，但是这位妇女却显得非常轻松，边走边唱，从我们身边经过时还冲着我们开心地笑。我曾经亲自试着提了一下，那些妇女们顶过的东西非常重，但是她们却总能轻松地顶着走，而且还不用手扶，真的让我非常惊异。

在部队里面我学了一身本领，每天除了操练，就是学技能，当时我选择了学习汽车驾驶和汽车维修。在部队学东西跟在外面有很大区别的，每天都是固定的时间，一个班的人员，大家同进同退。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暗地里较着劲，学技能都是争先恐后，谁也不愿拖班里后腿。这样既有竞争力和压力，又都保持着团队友好合作精神。一个人过不了关，全班的人员陪在旁边给你加油打气，教你如何更能掌握技巧，那种氛围和士气真的很振奋人心。在部队的这几年不仅锻炼了我的心智，更让我掌握了让我赖以生存的本领。

1975年我光荣退伍，走出军营，走向社会，被分配到大良的一家石油公司做司机。那时有份正式的工作，就属于工人阶层，再加上手握方向盘就更是让很多人都羡慕了。虽然工资只有42块5毛，却也够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开支了。我的主要工作是去湖南运煤，我们出去时是一部车配一个修理工和两个司机。公司规定三个月换一次班，回来休息半个月，经公司报销各种费用后，再整装出发。我们每次出车前要带上足够的大米和其他生活用品，那时一个人一个月有30斤的口粮。等到了湖南当地，我们偶尔也会从自己工资中拿点钱出来换点肉票，改善一下生活，犒劳一下自己。司机这个职业我一做就是30多年，后来又转行做了十多年的汽车维修工。



锦岩公园
承载儿时记忆

退休后，我依然闲不住，平时也乐于助人，只要有时间就喜欢帮邻居们摆弄摆弄电器，这些年竟也被我修好了不少东西，这不刚刚还为社区修好了一个音箱呢。

难忘的军营

周永松口述 宋焕珍 周美华整理

我叫周永松，是广东佛山顺德大良镇人，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高小毕业。1956年参军，在湖南服役四年。1960年退伍，转业到凤城公社卫生院工作，后调到大良卫生院任职药士，负责管理采购药材，一直到退休。



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遥远了，可是对于我来说，似乎就在眼前。退伍这么多年，我一直无法忘记，闭上眼睛，都是当年的生活。梦里，也许物是人非。可这梦啊还是反反复复地做，从来就没有停歇过……

童年的我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富有正义感。喜欢攀岩上树、下河游泳、抓鱼等活动。我无师自通学会了蛙泳和狗刨。我还喜欢听大伯讲故事，大伯擅长讲古时候的剑侠劫富济贫、除恶扬善的故事。每当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草上飞”等武侠故事时，我都瞪大眼睛听得津津有味。这些故事给我的童年带来了不少欢乐，并且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唤起了对受苦受难穷苦百姓的同情和对剑侠的崇敬，梦想有一天自己能做个除暴安良的剑侠。那时候大伯讲得最多的事情，竟是中国惨遭日本蹂躏的历史事件。我每次听“七七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那段血腥的历史，都让我义愤填膺，心里默默地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去当兵，保卫我的祖国。

1937年的中国是命运多舛的一年，是内忧外患的一年。“水、旱、蝗、汤”四害肆虐，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真可谓“神州萧

条、生灵涂炭”。很多地方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老百姓卖儿鬻女，远走他乡。这年的12月，我如期地降生了。在这多灾多难的年代，善良的父母无力给我大富大贵的生活，只希望我永远像松树一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所以给我取名叫永松。

有句老话说“生不逢乱世，是人生的造化”。而我恰恰是生逢乱世，但对我来说，这种人生历练竟是我的一笔财富。我不甘于生活平淡，只有更多地磨砺自己，才能让自己更加坚强。长大后我知道自己决心要去当兵的，所以在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强迫自己每日必练半小时普通话。广东人能听懂普通话的寥寥无几，能说好普通话的就更凤毛麟角啦。而我普通话说说得比地道的北京人还标准，以至于后来在部队几乎没有人相信我是广东人。

我是1956年入伍的，那时我在均安上班，接到大伯托人带来的口信通知我回大良去体检。当我跟领导请假时，激动得都语无伦次了。马上从均安搭自行车去了小榄，再从小榄搭车到大良体检。可能由于我的执着感动了上天，这次征兵让我如愿以偿地走上从军之路。

我是在湖南服兵役的，还记得当时的班长人很好。那年的中秋节，也是我第一次在他乡过中秋。虽然那时物资紧缺，但部队的生活物资还是可以保证的。我们有新鲜的猪肉、鸡蛋、罐头和水果，节日的气氛至今记忆犹新。战士们紧紧簇拥在一起拉家常，一个个脸上都荡漾着幸福的笑容，快乐的神情写在我们这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上。当晚官兵们围坐在一起，吃了



入伍通知书



一顿丰盛的团圆饭。

当夜幕渐渐深垂下来，天空中闪着或明或暗的星星时，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明月，我陷入了沉思，特别想回家，特别想念亲人。班长见我思乡情切，就自掏腰包买了包广味伍仁月饼送给我，并对我说：“男儿志在四方，吃完这月饼就不会再想家了。”班长的话语让我热泪盈眶，让我想起当兵的初衷，脸上不由泛起了红晕，深感自己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我告诫自己以后要好好学习，争取迅速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子弟兵。在这和谐友爱的环境里，我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由于我会讲普通话，到部队后就被选去当卫生员。和平年代，没日本鬼子可打了，学点医学知识，帮助祖国人民减轻疾病的痛苦，也是非常高尚的。那个年代的人单纯得透明，“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听从党安排”、“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这些闪光的话语可不是挂在嘴上的时髦口号，也不是贴在脸上的漂亮标签，更不是贫乏空洞的政治说教，而是每个革命战士虔诚恪守的做事准则，说一不二的行动誓言。

我从入伍来到部队的那一天开始，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这个集体，融入到这支铁流之中。饭堂、操场，学习、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尽管单调，但我一点也不感到乏味和枯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是使命，那是需要，那也是我极其喜欢做的事情。

实习那段时间，非常充实，非常兴奋，对医院的各项工作、流程都很感兴趣，也很享受刚踏入社会的新鲜感。每天早饭后，我都会急急忙忙地赶往医院，为的是在他们上班前赶到，帮助他们打扫卫生、整理器械。我知道，虽然是去实习，但我代表的是解放军，得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过去。医生、护士们看我年纪虽小却勤快懂事，都非常喜欢，很乐意带我这个解放军徒弟，想着办法让我多进行实际操作。当我第一次接触病人时，心里突然生出了一种使命感，尤其是当我穿着医护服出现在病房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神圣很伟大。那时我就深深地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和生活的美好。

由于部队医院实行军事化管理，各项临床操作都很严格，对每个卫生兵要求都很高，不仅是护理要操作规范，而且对病人的态度要好。于是我在值班时经常会与病人沟通、谈心，多了解病情，帮助病人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更好地去养病。从中深深地体会到，卫生兵这个工作的艰辛和所肩负的使命。实习结束后，我被安排做卫生教派员，负责采购卫生用品，因此经常会外出办事。

我是1960年退伍的，转业后被分配到顺德大良凤城公社。刚开始卢主任派我去农场，后来看我有在部队做卫生员的经历，就又安排我去大良卫生院(当时是凤城公社卫生院锦岩卫生院)做药师，专门负责药品管理和采购。工作看起来虽然轻松，但我还是以军人的姿态，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知

道：这项工作丝毫马虎不得，稍微一点差错都会要了人的性命，如果那样的话，就跟日本人在中国滥杀无辜的兽行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上班时一般不和人闲聊，很认真地核对每种药的药名、药量，最后还要复查一遍。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在这岗位上做了几十年，从没出过一丁点错漏。

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这机械的动作，虽然没有像一线医生那样让人敬仰，但只要看到那些病人从我手中接过药之后满足而归的神情，我也会很快乐。所以在这个很平凡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

一晃离别军营五十三年了，每当我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时，总是忘不了那军营的中秋之夜，忘不了那盒广味五仁月饼，忘不了那亲如兄弟的深深情谊。五十多年了，当年的战友还保持着联系，相隔不远的战友每年“八一节”都还会有聚会。“流过多少汗哪，但我从不后悔。吃过多少苦啊，但我从来不得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兵……”。



戍边军人冯国群

冯国群口述 宋焕珍 周美华整理

我从一个军人转换成为一个机关干部，当中除了我自身的努力奋斗外，我最要感谢的是党，是党把我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再到干部，如果没有党的培养，我将无法实现我的梦想，更没有我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在林姑娘带领下，我们走进了冯国群老人的家，他正在里屋歇息，知道我们来了，颤颤巍巍地扶着轮椅从里屋走出来。颤抖的双腿，佝偻的脊背，真不敢相信这个平日里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老人，年轻时竟然当过边防战士，时时刻刻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想要了解他当年参军的英勇故事时，老人明白了我们的来意。起身回屋拿出了虽然尚存却已泛黄发皱的复员证、立功证、军功章等，还拿出一张被镶嵌起来的照片。60多年过去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了，现在我们年轻的一代，或许不了解这段历史，在大多数人们的眼里，也许记不得这些老功臣的存在。但共和国的历史上确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付出太大了，历史会为他们作证。请不要因为没有战争、没有灾难就忘记他们，请不要因为现在富有而看轻他们。当边关有难，当人民遇到灾祸时，冲锋在前的就是他们。他们的血永远是沸腾的，他们的心永远连着祖国和人民。

当问及老人以前经历的时候，老人一直不停地用手抹去军功章上那厚厚的灰尘，我们递上纸巾帮他擦拭后，他又接过

纸巾不停地在照片上擦拭，直到一尘不染。可见老人对自己军人形象尤为在意。从照片上年轻时的他英气逼人。这时他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远方，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开始向我们讲述那遥远的往事。

我叫冯国群，1934年出生在顺德均安，现定居顺德大良，今年79岁。

小时候家徒四壁，但贫寒的家庭锻造出我勇敢、顽强、坚毅的性格和奋发进取的精神。我们家兄弟姐妹也多，我是第11个孩子，单是每天一家大小吃饭问题都是令父母头痛的事情。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更不用说拿出钱去读书了。可屋漏偏遭连夜雨，在我十多岁时，父母就先后离我们而去了，日子变得更加艰难。大哥以长子的身份开始操持这个家，他不想让我去读书，一来可以节省点开支，二来可以多一份劳力增加点收入。但我也不知为什么非常渴望读书，每次干完活，就偷偷地在学校窗户外听老师讲课，每次听完课，我感觉心里就好像亮堂了好多。我嬉皮笑脸地跟大哥软磨硬泡了很久，他才答应我可以去上学，但放学后就要及时赶回家帮忙煮饭、割草、喂鱼等。

读了半年书后，1951年政府出台征兵，我就偷偷去报了名。家里人知道后都极力反对，当兵就要打仗就会有牺牲，再说家里也少不了我这个劳动力啊。可我还是坚持要去参军，当时正是解放初期，我是认定要去当兵，认定要走保家卫国这条路了，一个有骨气的青年，只有这样才能有出息。所以，不管哥哥们怎么反对，我都没有妥协。

体检和政审都过关了，心里特别的激动。接兵那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是我人生的道路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当武装营长把一张鲜红的入伍通知书送到我的手里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热切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真想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我太幸福了。

初入军营，部队的严格让那些小青年们有些吃不消，而我的感觉完全不同，部队简直就是我的家，从来就没对它感到陌生过。我好像浑身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训练完了，别人休息，我还在看书学习文化知识，所以我各方面都进步很快。

1952年，我被调去县公安队当副班长，因为年纪小被部队编入甲级班学习。那时刚好广东省办文化学校，是六年级的，读一年就算是高小毕业。我很荣幸有这么个学习的机会，所以当时我特别珍惜。我想“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为着这个目标，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去，连睡觉、吃饭都尽可能地缩短时间，只想多学一点知识，一年之后我顺利地完成了高小学业。

自从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在“总统”复职的典礼上，蒋还振振有词地叫嚣，不久就要打回大陆去。1953年，在我国边防发生了东山岛战役，大陆军民共同反击国民党军窜扰，最终我军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野心。为了加强边防力量，我被调去汕头部队担任排长，在边防部队保卫祖国的边疆。1954年，蒋介石开始叫嚣“光复大陆”，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我边防部队全部进入备战状态，随时准备着战斗。

为了守卫边疆，为祖国作出贡献，我们真的就像现在歌词里唱的那样，“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小白杨，小白杨，它长我也长，同我一起守边防”。真的是哪里需要哪里到，哪里需要哪里扎根。即使那儿难以生存，我们也不会畏惧、不会后悔，不会后退的。南方的天气多变，烈日炎炎，热得透不过气来；有时也会倾盆大雨，淋得连眼睛都睁

不开。无论什么天气，我们都宛如一棵青松傲然挺立，决不松懈。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这期间我由排长升为少尉。

由于当时局势极不稳定，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派遣到别的地方去。不久部队就转去到黄冈（边防前线），那段时间部队里都变得很紧张，人人都绷紧了弦，没一人敢放松思想。大家时刻准备着，只要一声令下，立即都可以开战。台湾当局时常会派一些间谍过来，这些间谍化妆成黑帮老大，刺探我军军情。期间，我边防军也抓到过不少间谍。而我也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被组织调去做总参谋长的。

但是，到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经过三大改造，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力量也比以前强大了，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这是蒋介石困居台湾所无法比拟的。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那些饱尝过人民解放军厉害的蒋军官兵都很明白，“反攻大陆”其实现的可能性实在太小。这5年里，蒋介石“反攻大陆”不但没有成功，倒是担心大陆解放台湾而受惊不小，最终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1958年局势平稳后，我又去过饶平县，后来又去了山东。我在山东一呆就是5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航校体育主任。当时，我的实践经验是相当丰富的，而理论方面相对薄弱，所以工作之余不断补充我的理论知识，提高自身能力，更适应工作的需要。几年时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海航飞行员，为国防部队补充了很多新生力量。

1963年从部队转业后，我分到云浮银行做营业所主任，以前一直在部队，从未涉及到金融这块，所以这项工作对我来说非常有挑战性。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加上我不服输的性格，也就欣然地接受了上级的安排。那时，云浮银行初具

雏形，要让它能够正常运转起来并非易事，我深深地感到，这副担子不比部队轻啊。为了能尽快地融入到工作中去，我到处找有关金融方面的书籍和材料，不分白天黑夜地啃专业知识，学习管理方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银行运作很快就有了起色，并且慢慢步入正轨。我的工作成绩也得到了上司的肯定，不久就将我升为云浮银行的主任。1978年才调回顺德农村部（农委），直到退休。

手枪队长邵甫

亲历者刘芳 手枪队队员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84周年之际，我特别怀念入伍后朝夕与共的特务小队手枪队队长邵甫。

邵甫1929年出生于广东省怀集县甘洒镇南洞坑一个贫苦家庭，1947年2月参加粤桂边纵队飞雷大队。1948年6月，连江支队司令员、政委周明率令飞雷大队从广宁出发，经四会、清远、英德挺进连阳。八月中旬到达阳山黄岔乡高坡村，与阳山下坪武装起义部队汇合后，留下两个排与起义部队组成番号猛虎、雄狮、东岳、铁流的四个中队。邵甫编入猛虎队任手枪班班长，同时还担任中队长麦永坚的第一警卫员。

邵甫在广东清远、连阳和湖南的广大地区，历经数十次战斗，表现出色，随着部队发展壮大，被提升为特务小队手枪队队长。他因家穷，没钱读书，入伍时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入伍后利用战斗空隙刻苦学习，能默写《三大记录》、《八项注意》和《反对自由注意十一条》。

1948年12月，猛虎队七十多人在连南寨岗镇鱼冲村背的一条小山冲隐蔽，因内奸告密，被国民党军队及反动民团一千多人包围。邵甫第一个爬上岩顶杀入敌阵，冲出包围圈。1949年6月，猛虎队从湖南转战连阳，路经连县潭源洞时，被星子敌保警营及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当地反动武装300多人包围，邵甫奉命率领二、四两个步枪班摧毁敌军指挥阵地，击毙敌军指挥官朱耀宗。猛虎队在连县金星中队协同下，全面出击，取得战斗胜利。7月，夜袭连县龙萍自卫中队，因距离连县敌人较近，部队领导要求特务小队必须在一个小时内结束战斗。邵甫带领特务小队在半个小时就全歼50多个敌人。

1949年夏，时任阳山国民党县长李谨彪（国民党师长）乘我连江支队五团主力北上湘南之机，纠集全线反动武装1000多人在连县李楚瀛（广东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支援与策应下，对游击区大规模清剿。敌军攻占我黄忿、坑菜、杨梅平原地区后，在攻打高陂村时，遭到高陂村民兵中队的顽强抗击。高陂村是进出东山游击区的重要门户。敌人集中400多兵力对高陂村疯狂进攻的同时，令招收下山的土匪吕桂生中队进驻在黄忿乡湟川坑江嘴自然村，妄图阻止我武工队和山区民兵对高陂民兵的支援。这股匪兵抢夺百姓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我方下令必须把这股匪兵除掉。



1949年9月下旬，猛虎队120多人在黄堂武工队配合下，从秤架乡白竹塘村出发，午夜时分到达江嘴村外围。先用三个步兵班布防在西南面阻击杨梅，水圳支援之敌。凌晨2时，麦永坚下达攻击命令，邵甫率领手枪队和一个步兵班30多人迅速爬过敌人驻地前沿田基，绕到屋后。爆破组躲过敌人流动哨，把七斤多重炸药包放到屋墙下。队员们随着一声巨响，高声喊杀冲入敌军阵地，歼灭多个敌人。当我们冲入敌人营房时，藏在暗角的敌匪抱着我们死拼。邵甫进行第二次爆破，未料倒塌下来的瓦砾、房梁、砖块阻碍了我们冲锋的去路。冲在

前面的邵甫爬过障碍物时，被楼上敌人机枪击中，子弹从腰左侧钻到膀胱后面出不来。

这股匪兵虽只有40多人，但多是流氓地痞，敢于拼死卖命，战斗十分激烈。最后，除手被打断的匪首吕桂生带着8个匪兵藏在水涵洞侥幸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灭。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邵甫重伤外，文化教员陈继贵当场牺牲，二排长陈彩、班长麦天德负伤。

次日，部队回到白竹塘，掩埋了陈继贵遗体后，转移到坪架乡东坑坪游击区。三位伤员住在离部队驻地只有三、四华里的石梨磅医疗站。我每天中午休息时间带同两、三位战友到医疗站看望他们。卫生队长陈明带着从连州中学征兵入伍的丁浪、李路、丁文三位女生卫生员分别为三位伤员专人护理和治疗。



伉俪情深



邵甫伤势最重，子弹头在20公分的深处。部队领导派人到大东山医疗站寻找能用生草药驳骨和脱子弹头的黄桂英（人称她为二嫂）。因敌人扫荡，医疗站转移地点而耽误了时间。时值天气炎热，邵甫伤口腐烂化脓，时年17岁的丁浪给他清洗伤口时，见他痛得大汗淋漓，半闭双眼，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也不叫半个“痛”字，忍不住眼泪直流，她扭开脸擦去泪水后又继续为他清洗伤口。邵甫看见了，反而安慰她：“要坚强，不要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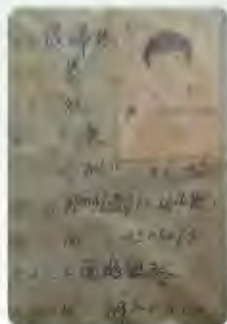


第四天中午，我去看邵甫时，见他呼吸急促，处于昏迷。我情不自禁伏下身子，摇动他的双肩，大声呼叫他的名字，他似乎听见了，困难而断续地说出：“……革……命……”二字之后，四肢抽搐。我急叫陈明，她悲痛地说：“剩下最后一支强心针给他打过了。”不一会儿，这位年仅20岁的共产党员、猛虎队手枪队队长停止了呼吸，永别了人间。

如今，60多年过去了，邵甫平时和蔼可亲的形象，战时英勇杀敌的气概，一直活现在我心中。他为了劳苦人民的解放，为了共和国的诞生，在极度痛苦的弥留之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记挂着革命。他短暂的人生是何等亮丽，他的精神情操又是何等高尚啊！

备注：本文摘录于《老人报》
(2011年8月3日(第38期))
该报由刘芳老人提供





风云海疆

张瑞林口述 周美华 宋焕珍整理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远航的水兵多么辛劳，待到朝霞映红了海面，看我们的战舰又要起锚……”。这支海上小夜曲，像轻微的海风，像温柔的海浪，安抚着远航归来的战士。每每听到这首《军港之夜》，就会唤醒我贮藏在记忆中的那段军旅生涯，那些曾经战斗的岁月……。

曾经穿过军装的我，每每想起那无边无际的大海，眼中总是充满激动的泪花；每每想起那劈波斩浪的战舰，总是感到心潮起伏；每每想起那身白色的水兵服，总是感到无比自豪。几年的军旅生涯，一千六百多天的日日夜夜，一生的军人荣誉，怎能让我轻易忘怀呢？

我的家乡是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台山市。台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部，毗邻港澳，南临南海，幅员辽阔。台山本地户籍的人口约100万，旅居海外及港澳台等侨民有130万，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侨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激进的年代。那时的生活极其艰难，人们过着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日子，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就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年代，1966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在家里我排行老大，虽然当时生活非常清苦，但和所有同龄的农村娃一样，不谙世事，很容易满足。有时一块泥巴、一个自制弹弓、或者一个小小的昆虫，就可以带给我们无穷的乐趣，所以我的童年依然感到很快活。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读了几年书就辍学了，总想着能赚点钱改



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无奈年龄小，只能照顾弟弟、妹妹和做点家务，有时还下地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得想办法让自己走出去。

1984年，这一年是我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我已经18岁了，长成1.7米的壮实小伙子了。感谢父母给了我一副健康的体魄，让我轻而易举地被选拔为一名南海舰队的海军战士。当时那种高兴真是无与伦比，父母、亲属等也都为之骄傲。同时我也暗下决心：去当兵，我就一定要当个好兵。

入伍后，马上进入训练期，我们是在虎门沙角训练。当时，我主要是学习雷达这方面知识，其它还有通信等板块知识。雷达非常重要，相当于舰船的眼睛。在祖国漫长的海防线上，有一道看不见的警戒线，时时刻刻监视着祖国的海空，这就是人民海军的雷达兵部队。海军雷达兵部队的特点是：驻地极其分散，生活环境极其艰苦。有的战士甚至从入伍到退伍，都没有见过部队团、旅一级的指挥官。正是这些日夜坚守在岗位上的雷达兵战士，为共和国织就了一张巨大

的，保卫祖国海空的监视网。他们巡弋在辽阔的海防线上，只为了心中那保家安邦的神圣信仰。

由于我的基础知识底子薄弱，学起来挺吃力，但我相信只要我多花点功夫，我一定能全部掌握航海雷达知识和技能。所以我不敢有半点马虎，每天六点半就得起床操练，晚上别人都走了，我总会在那里反复多练几次，遇到有什么不懂的就会一直问明白为止，不熟练的就做多几遍，甚至做上几十遍。就这样每时每刻都严格要求自己，硬是没让自己落后一点点。



功勋舰502舰



发生海战的赤瓜礁

即使是日常生活小事，我也做得很认真。在这6个月的训练期间，同时也把普通话练标准了。因为在部队，细节往往能决定成败。一次乌龙事件，也是因普通话不标准而引起的。有一次我舰在南沙值班，我的一个班长，晚间正好值班，首长让他报告越南舰船离我军有多远，这干事是阳江市人，普通话讲的不标准，本来是10.4海里，这是属于安全距离范围内，但经他一表述，竟说成4.4海里。这下可不得了啦，首长马上拉响警报，睡梦中的我们连滚带爬，有的还掉到地板上了，全舰人员立即进入到临战状态。

经过半年的训练，我终于可以上舰试航了。我们的试航基地是在广州。第一次试航很激动，整个试航过程我都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任务完成的很出色。第二次试航在万山群岛，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到达那里，我们遇到了12级的台风，这并不

可怕，因为航海的所有知识我们都培训过。当在海上航行的船舶遭遇台风时，为了避免被卷入台风中心或中心外围暴风区，一般采取以下3种避航方法：如停（滞航）、绕（绕航）、穿（迅速穿过）。船舶可根据台风的动态和强度，不失时机地改变航向和航速，使船位与台风中心保持一定的距离，处于本船所能抗御的风力等级的大风范围以外。所以我们主动采取了应急措施，迅速果断以绕航的方式，离开了台风中心。

在海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晕船，尤其是绕航时的那种晕船的滋味，真

是让人生不如死，即使很有经验的船长也不例外。听说，之前真的有人因受不了这种晕船的滋味而跳海了。我那时也是晕的很厉害，差点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回到部队睡了好久，身体才恢复正常。

文革期间，国家无暇顾及到海军这块，这期间国内海军几乎没什么战斗力，直到八十年代才进入海军提升阶段。记得那年，我们部队只有161号、162号、163号、164号4支驱逐舰。海军舰队战斗力薄弱，设备跟不上，培训知识也有限。整个4年半的海军生涯，我记得只打了6发子弹，扔了几个手榴弹（不过当时弹药也紧缺）。八十年代初，海军力量开始有所提升，我们也开始关注远洋海域。这时，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早已在疯狂掠夺南海岛礁了。

由于越南、菲律宾等国肆无忌惮地在南沙抢占岛礁，窃取我国石油资源和渔业资源。为了加强防御，我们开始频繁出海。出海时风平浪静还好，只要有风浪，听说要出海，当时



荣誉证书



连死的心都有了。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得无条件地去执行任务。不过，晴天总是多过雨天，愉快的日子还是占大多数。最开心的是我们航海抛锚的时候，这时大家就自由自在了，有钓鱼的，海里的鱼各种各样、五颜六色，也容易上钩，有时很快就钓到几桶鱼，接下来的一餐就是全鱼宴了。

1988年，南沙的矛盾愈发尖锐。为进行联合国委托的74号海洋观测站建站工作，海军编队前往南沙永暑礁海域。越南判断，在苏联海军的支持威慑下，在远离中国大陆的南沙海域，中国海军无法有效地进行攻击作战；再加上中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经济改革陷入困境，正面临调整，所以更不可能选择此时发动军事打击。但越南没有看到的是：苏联深陷在阿富汗山地游击战的泥潭中，已无力南顾；中国的改革开放虽遇到了经济过热的难关，但它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海洋对未来中国复兴的意义。由于越南对我军的判断失误，终于爆发了一场小规模海战，历史上称“3·14”海战。当时我们舰是此次作战指挥舰，随时监测敌军海、空动向，于是我亲眼目睹了整个战斗过程。

1988年1月31日下午，海军在永暑礁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2月18日，龙年的大年初二，中越两军在华阳礁对峙，后越军撤离。3月14日，越军趁夜间1时低潮登上赤瓜礁。我国海军分属东海、南海舰队的502、531、556三艘导弹护卫舰巡视赤瓜礁海域。近8时，海上指挥陈伟文向502舰政委李楚群下达登礁命令。20分钟后，陈伟文下令驱逐礁上越军。越军一开火，我登礁人员迅速开火还击并后撤，以利舰炮发出火力。九点一刻战斗结束，我海军舰艇击沉越军604船、605船，击毁505舰（该舰原属南海舰队，1974年3月赠送越南），

击毙、伤敌60余人，俘虏越军40多人，我方仅一人受伤，三艘舰艇轻微受损。

战斗结束，战士们兴奋异常，傍晚时刻传来消息，中央军委通令嘉奖，肯定海上指挥坚持自卫原则，严守战场纪律，打出了国威军威。

为避免打胜仗后部队松懈和越军利用空中优势报复，海上指挥陈伟文命令，向越南海岸线前进，让各舰特别是531舰（该舰为我国建造的第一艘对空型导弹护卫舰）作好反空袭准备。各舰均感责任重大，各战位保持高度警惕。直至到达集结点之后，陈伟文才宣布海上编队已返回我国领海。整个撤离战场过程仅海上指挥部和各舰少数人掌握航线，海军将领的指挥水平实在令人佩服。此战之后，我海军在南海护航的征途上，挺胸昂首扬帆万里，越军舰船闻风丧胆，纷纷躲避，甚至悬挂医院船标志以示无害。从此，我海洋观测站建站工作，无人再敢干扰。

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海洋国土的概念日渐深入人心，我们的海军部队也在不断成长、壮大。而我们海军也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承载着维护和平的重任。如今南海、东海，南沙群岛、钓鱼岛等对国人已不再陌生。

1989年，我退伍了，回到了阔别4年半的家乡，开始经商。随着时代科技的发展，后来在顺德也做过几年的电器维修工作，还和朋友一起投资健康与环保这块，现在定居顺德。



林兴祥的往事

林兴祥口述 周美华 宋焕珍整理

“穿尘而过，几番阑珊，透着分明的素月。信步时光的长廊，深深的游思，始终是不缺那一笔风雅，始终不能轻易遗忘。其实有念，其实柔然到那么深刻，其实到翻来覆去那样难以割舍，又怎能将此心掩埋？又怎能将一切搁浅？”

我这一生没有轰轰烈烈过，也没有大富大贵过，但却是努力奋斗的一生。其实只要尽力了，人生就没有遗憾。

我叫林兴祥，今年78岁，1935年4月9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那个年代，大部份人都过着三餐不继、衣不遮体的生活，读书就更是一件奢侈的事了。我们家也是一样，解放前家里什么都没有，住在土砌的半塌的房子里。父亲长年给人家当雇工（在三篷艇当搬运工，帮助运输），靠做苦力养活一家人，就是这样也不够大家吃稀饭糊口。

父母亲都没读过书，常说自己过着黑灯瞎火的日子。我是家里的男孩子，父母亲很疼爱我，对我也有着很高的期望，一直都希望我能够上学堂，做个知书达礼有出息的人。在我6岁时，父母狠心拿出一家大小牙缝里挤出来的米（当时，上学的学费是大米，一个学期交15斤米），把我送去私塾念书。而我也很懂事，知道读书的钱来之不易，在学校安分守己、勤奋好学，教书先生都特别喜欢我。就这样，我读了7年书，到13岁时就高中毕业了。

1950年，全国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一改革让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田地。那时的高中毕业生也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了，父母都以我为豪，觉得我有思想、有主见，是个文化人，我也希望能够继续读书深造。可我看到日夜奔波劳碌的母亲（当时父亲已经去世）在慢慢地苍老，不忍心再让她劳累，便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愿望，留在家里帮忙张罗生计。想着一家老小就守着几亩田也不是个办法，更何况那时种田完全靠天吃饭，遇到旱涝年，就有可能颗粒不收。那时，在我们当地，有一份很赚钱的职业——撑船，但是相当辛苦。当地人常说，“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卖豆腐。”可为了改善家里的条件，我毅然地选择了人生第一大苦：撑船。我能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是受到了四书五经的影响，孟子有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正是读了这些书才明白，只有无所畏惧地勤奋努力，才能改变现状。而母亲和哥哥知道我的决定后都竭力阻止，担心我身子骨单薄，经不起这般风雨。但最终母亲的泪水，也没能拗过我的执着。

那时我虽然只有13岁，但因有些文化，他们就收下了我，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每个月给我开10块工钱，还包吃。这在当时来说比一般成人劳动力的工钱还要高。我高兴得浑身



都有使不完的力气，干起活来很卖力。我要出船的地方是在勒流，我撑的那船载重3.6万吨。当时我就像一只不惧雷电的海燕，每天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也不觉得辛苦。长期的日晒雨淋把我从一个白面书生打造成了“非洲人”。也正因为这些饱经风霜的经验，让我后来在部队不怕苦不怕累，干出了一番成就。

时光荏苒，转眼在船上就过了三个春秋，我已经16岁了。当时社会流行的口号是：好铁要钉钉，好男要当兵。受此影响，我又独自跑去检兵，第一次因年龄太小被刷下来。第二年又去，不知什么原因还是没能检上。可我就是不甘心，1956年9月我第三次去检兵，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我终于得以通过。10月份我就正式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短暂的新兵训练后，组织就调我到部队管理后勤，统筹安排部队1600多人的伙食。那时正好是抗美援朝结束没多久，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没全部撤出朝鲜。朝鲜战役之后，我军的经济条件更艰苦了。部队领导从我这张“非洲人”脸上，看到了我丰富的人生阅历，所以委以我这个新兵蛋子如此重任。

别看我只有二十多岁，我可不比一个精打细算的主妇差，硬是把1600多人的伙食安排得井井有条。那时，从军官到伙夫，除粮食外，每人每天一律只有4毛3分3的油盐柴钱。党政工作人员和部队一起吃大锅饭，无一例外。一年之后，经后勤部统计，我节约出了大量的粮食，我用富余的300元钱买了8头牛。1957年，组织就任命我为给养员，专门接待到我们部队来视察工作的上级领导，同时还亲自下厨。他们都夸我直爽开朗、亲切随和、热情主动、说话得体、办事灵活。我在部队深受领导们的认可，1959年9月9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半后，我又荣升为正排长（副连级），同时被评为“五好战士”，我们连队也被评为“四好连队”。没多久，



司令部又调我去做副指导员，两年后升为参谋长，主要兼任外交和保密工作。

1965年，蒋介石欲发动“反攻大陆”的战争，边防吃紧。我团在广东东莞驻扎布防，还有一个炮兵团协助，主力驻守在韶关。我军预计台湾会派遣20万兵力在福建厦门龙奶登陆，故我军布防数倍于敌的兵力，想一举歼灭敌人。当时，我边防运输不足，弹药紧缺，要靠自己组织兵力协助后勤补给。于是我想到了发动民兵，这样所有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由于我在农村呆过，知道怎么去处理军民关系，很快就发动群众组织到了50万民兵。我调动了13万民兵来做演习。国民党看到大陆军民团结起来，共同保卫边疆，再加上国民党“八六海战”的失败等原因，老蒋受到了很大打击，所以就不敢轻举妄动，最终“反攻大陆”也就不了了之了。

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们经常派遣特务到大陆来捣乱。记得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战友打完坑道口往回走时，发现了两个特务，追到中英街抓到一个人，另一个跑到麦田逃脱了。

1964年党中央作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决议，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因为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瘠薄荒凉，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带，就是平原也是波洼起伏，高低不平。还有很多地区属盐碱地，白茫茫一片，草木不生，这样的农田从根本上需要改造。当时湖南省省委书记华国锋，看我工作表现突出，特别写信指名让我留下在湖南工作。我就在湖南洞庭湖区域带领部队围垦造田，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开垦出3000多亩农田都达到了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每亩产量达到860斤，后来都交给了千山湖农场。后来，我们又到永江开垦荒地种花生。第一年花生亩产有360斤，第二年就翻了一番。我们办了油厂，将收获的花生榨油。由于贡献突出，我还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并荣立三等功。

在越南国家统一战争中，中国给予越共极大的物力人力的支持。七十年代初，我放下锄头，作为第二期兵随部队前往越南，支援修筑“胡志明小道”。“胡志明小道”在越战期间是一条举世闻名的秘密运输线，通过这条运输线，可以把国际援越物资、越南北方支援南方物资、军事人员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南方游击区，这样就能有力地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及西贡政权的斗争。美军发现“曲径通幽”的胡志明小道后，十分恼火，妄图通过空中优势将其封锁切断。胡志明小道常年暴雨不断（有时候是美军的人工降雨），再加上美军的狂轰滥炸，道路状况非常恶劣，所以道路抢修是一件非常艰巨、更是非常危险的工作，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曾经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战友一起去验收小道，我走在中间，突然美军低空袭来，我和战友立马翻身滚进坑道内。就

在同时，一枚炸弹落在我们身边，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我就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才醒来，发现自己满身是血，趴在我旁边的两位战友更是血肉模糊，面容焦黑，已经没有了生息。两位年轻的战友就这样牺牲在自己的面前，美军的飞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一拳深深地砸在泥土里，内心深处对美帝侵略者的痛恨无以言表，恨不得一挺机关枪把他们全扫了。所以，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珍惜，都应该为和平而努力。

文革时期，我又调到湖南，在湘潭有幸见到了毛主席，不言而喻我的心情是相当激动。虽然没有和主席交谈，但能够这么近距离地看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脑海里都是毛主席当时的音容笑貌。

1980年，我退伍分配到顺德农林局工作，负责园林工作。整个局分19个单位，都是在同一个大办公室办公。我一分到局里，大家都推荐我担任局长，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在部队我的确做出了些成绩，但在这里，我得从零开始。办公室里的同事个个高学历，最低都是专科毕业，而我只有高中学历，于是我就申请到华南农业大学去学习。三个月后，3门功课考试，我以299分的好成绩取得华农大专文凭。

回到局里后，我担起副局长的责任，开始着手开展工作。我以园林作为开展工作的切入口。说到园林，现在广东省有名的陈村花卉世界，就是经我一手做起来的。我利用在部队的关系，认识了中央林业局的一位工程师，经他引荐，我又认识了同系统部门的很多人，如：林业厅的、种药站的、省农委的等等。有了这些关系，就更有利于开展我的工作。那时分配给我的办公经费只有8000元，我就去找经委协助，得

到时任广东省顺德县县委书记黎子流的接待，黎书记将我们的情况反映到有关部门，我们的经费提高到了1.6万。我用局里借来的400万，自己征地，试点种苗木，试验地点就选在陈村，设4个苗圃场，每个场占地70多亩。然后买来70吨碳安、8吨尿素、6吨菜油、6吨石油、4部农用车等农用物资，开始轰轰烈烈地发展园林。那时，只要种一亩林地就补贴1500斤粮食，我们部门拿到了纯17万斤粮食的补贴。同时，我们还搞第二产业：养猪、养鸡、养鱼。我们把种的花、补贴的17万斤粮食以及禽畜全部卖了，卖的钱购买完种苗、化肥等原料后还有盈余，既有了经费，也保障了员工的福利。就这样循环往复，最后我们的园林事业做得越来越成功，3年完成绿化任务，第5年就达标了。后来发展成顺德大地园林，成为全国造林先进县区之一。为表彰我们部门的突出贡献，广东省委奖励我们一个价值7000元的金杯，由副市长周福添领回。

我这一生没有轰轰烈烈过，也没有大富大贵过，但却是努力奋斗的一生。其实只要尽力了，人生就没有遗憾。

城镇居民

青少年时期的回忆

龙源口述 周美华整理

如今
在我年事已高
白发苍苍之际
回想过往
那些事
逝去的岁月
足以让我
此生不悔

我叫龙源，1923年出生在大良，在家排行第五，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我们龙家虽不算家世显赫，但也是一个书香味浓厚的大家族，拥有自己的祠堂，并专门聘请了几个教书先生，不但有教中文的，还有教日语的。龙家的孩子都必须在这祠堂里读书识字。只要是龙家的孩子，在宗祠里面读书，全部不用交学费。

我实际上是由两个姑姑带大的，爸爸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打金师傅，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我两岁的时候，爸爸参加了一次游行示威活动，他是个激进分子，而且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被拍了相片。因此特务拿着相片到处抓我爸爸。被逼无奈之下，爸爸只好跑到新加坡去避风头。而母亲紧跟着丢下我们几个小孩子回了娘家，从此再也没回过龙家。我的两个姑姑只有肩负起照看我们的重任。在我的心目中，两个姑姑就是我最亲的亲人。后来我长大了，不管走到哪里，走得多远，都会经常回来看望两个姑姑。

记得在我六岁时，家里就安排我到龙家祠堂里面去读书。懵懂的我竟然对读书识字很感兴趣，因此我读书很努力，

从没有迟到早退过，经常被先生表扬。祠堂的教书先生里还有一个日语老师，是专门从日本请过来的。那时我觉得日语很好听又挺好玩，理所当然的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我惊人的记忆力，几年下来，我也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在读书期间，可能还没到十岁吧，父亲从新加坡回来了。这是我记事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我的父亲。对于父亲的一些认识和他的许多事迹，我都是断断续续从两个姑姑那里听来的。所以对于父亲，我是无比的崇拜和敬仰。他那高大的形象，一直占据了我幼小的心灵。可是回来后的父亲还是无暇顾及到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生病了，难怪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是很好。不幸的是只过了一个多月，父亲就死了。我都还没来得及跟他有感情互动，那些心里一直想对他说的话，都还没有机会说出来，他就这样匆匆地来又匆匆地离我而去。这次真的是永别了，从此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不过我并没有感觉到他的离开，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身边时刻影响着我，看着我，陪伴着我成长。

父亲从新加坡回来时还随身带回来一个铁箱，一直放在他的房间。后来，我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使劲用榔头把锁撬坏了，把铁箱打开来。里面其实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除了几件衣服和日常用品，我还看到了几份中央的文件。父亲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意外的发现确定了父亲的身份，也更坚定了我对他的敬仰之情。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及华东大部分地区。东部沿岸亦落入日军的控制范围。广东省一带的华南沿海地区是中国从外地输入各种物资的重要地点。为切断这条补给线，日军于1938年10月1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邻近地区，广州在10月21日沦陷。

1939年，我从祠堂毕业了，真的是十年寒窗苦读。这十年的

时光，将我从一个无知的少年，打造成了一個睿智的小伙子。这时的我满腔热血，意气风发。为了能更好地报效国家，我想出国留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鬼子入侵到顺德大良了。家里人因担心我的安危，就不让我出国。

一夜之间，整个大良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家家关门闭户，街上冷清、萧条，偶尔听到有日本鬼子的巡逻队在外面走动。我和我的家人也不敢外出，每天必须要用的、要吃的，也不敢上街去买。日本鬼子为了抓共产党，挨家挨户地搜。一天，有几个日本鬼子敲响了我家的门，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应对这件事情。安排两个姑姑藏起来后，我从容地打开门，镇定自如地用流利的日语跟日本人对话。为首的日本兵惊奇地张大嘴巴看着我，半天没说出话来。等他缓过神来，情不自禁得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并说：“中国青年，了不起！”

几天没有出门了，我在家如坐针毡。家里吃的东西也没有了，再这样下去全家都会被饿死的。我想，我得走出去！走出去，只要不被日本鬼子打死，总还是有希望活下来的。不能在家坐以待毙吧，何况我会日语，我想比其他人更有安全保障。思来想去，最后我出去了，我开始为家里的生计日夜奔波，跟着叔叔学做了几个月的生意，主要是贩买贩卖。卖过芝麻糊、粽子、糕点，还有其他的很多生活必需品，我都卖过。后来不记得怎么回事，陈村学校来了一封介绍信，我就是通过这封介绍信，到陈村的一个学校去做了一名教书先生。我身兼多科，国文和日语我全部教。

英国明白最终会与日本一战，1937年后逐步加强香港的防卫。1938年7月，港英政府通过了《紧急条例》，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积极备战。同年9月，便举行大规模的海陆空演习，期间大量难民从中国内地涌入香港。1940年，日本鬼子还盘踞在大良，香港还没有被侵占。香港那边的亲人来信让

我到香港去发展。我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带上了香港亲人的联系地址就出发了。我从广州坐火车去香港。依然可以从飞驰的列车窗口，看到祖国的满目疮痍，铁路两边到处是尸体，有被日本人打死的，也有没东西吃活活饿死的。到达香港的尖沙咀，已是晚上了，辨不清方向，我只有从怀中掏出了那张写有地址的纸条，找路人问清楚了怎么走，才搭车去找我的香港亲人。可惜在香港也没过几天太平日子，日本鬼子随后就入侵了香港。1941年12月7日，日本于夏威夷当地时间上午8时（即香港时间8日凌晨2时）偷袭珍珠港，不足8个小时后，日本在香港标准时间12月8日早上开始侵略香港，8时空袭启德机场，瘫痪英军防空力量，并袭击深水埗兵营。日军曾派代表要求英军投降，遭到港督杨慕琦拒绝。此时的香港也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天天炮火不断。老百姓也过着人心惶惶，心惊肉跳的日子。

就这样，香港我也呆不下去了，只有按原路返回。由于战火不断，坐火车是根本不可能，再留在这里也没办法谋生啊，怎么办呢？我下定决心，就是走我也要走回去！我什么也没来得及带，身无分文就出发了。为了防止走错方向，我还是从尖沙咀火车站那里出发，沿着铁路线走。一路上，我尽量避开鬼子的据点，走那些稍微偏僻且相对隐蔽的地方，但不会让铁路脱离自己的视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回家的路。第一天，白天一刻没停地赶路，脚上也打起了血泡，从早到晚我粒米未进，又累又饿。天擦黑后，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居民区，向好心的村民要点吃的，再向他们蹭个地方睡觉。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又开始走，休息了一个晚上，脚好像变得娇气许多，站起来的那一刹那，昨天打起血泡的地方钻心的痛，痛得我额头直冒冷汗。但我不能不走啊，呆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没办法只有咬紧牙关继续赶路。由于脚痛，比前一天走得慢点，但为了能早点到家，也

舍不得停下来休息片刻。这一天也是相安无事地过了。晚上还是到村民那讨点吃的，找个破旧的屋子和衣而睡。还好，香港的天气不是很冷，否则晚上睡觉不知冻成什么样子。白天有时看到地里有可生吃的瓜菜，也会摘点来充饥。脚上的血泡不那么痛了，因为那个地方已经磨起了厚厚的一层茧，鞋子也磨破了。接下来的几天几乎都是这样过的，一路上饥寒交迫担惊受怕，这种日子真的是种煎熬。虽然只有几天，但我觉得它是那么的漫长。第七天，我终于走到了广州，看到这个我出发去香港的城市，我竟然喜极而泣。因为我知道，到了这里，离家就不远了。

回到家正好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正在吃团年饭，走进家门，一家人都悲喜交集，最疼我的奶奶听到我的声音，哽咽着叫着：“源，源啊，来，过来奶奶这儿。”我走到奶奶跟前半蹲下身，奶奶抖嗦着伸出她的双手抚摩我的脸庞，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看看我的孙子是不是真得回来了？”我们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很庆幸我还能平安回来跟家人团聚。

这次回来后，我又去飞机场卖过包子。日军建飞机场时也被拉去装卸过泥沙……不管条件如何艰苦，我都努力地去保全家人和自己，毕竟在这种时候能活着就是最好的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我用我的所学和灵活机智与日军周旋，最终得以让我和家人，平安度过抗日战争这个非常时期。

中医痴人何泽礼

何泽礼口述 周美华 宋焕珍整理

采访何泽礼是在他的工作室，工作室的空间挺大，阳光空气充足，刚装修不久的房子弥漫着淡淡的茶叶清香味。进门的右边挂着一幅他的墨宝，上面写着8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精诚服务，保君安康”，左边还有几副古色古香的牌匾。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放着个木人桩，桩面上已被磨得锃亮发光，看来主人没有少折磨它。就这简单的室内陈列已尽显出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医的博大精深。他双目有神，身材适中，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给人一种干练睿智的感觉。下面是他的自述：

1948年，我出生在一个人人都向往的美丽大城市——广东省广州市。现已退休，刚开了这个中医养身馆，终于可以做我喜欢的事了。退休之前，我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在从教的41年期间，我通过自学先后取得了两个大专文凭：一个是中文大专文凭，另一个是中医大专文凭。

我从小喜欢中医，主要是深受爷爷的影响，而父母身体差也更坚定了我学医的信念。爷爷是个远近闻名、医术精湛、宅心仁厚、深受人爱戴的老中医。爷爷给穷人看病不收钱，那时老百姓生活贫困，很多人病了无钱医治，有的拿点日常用品，



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会认真地对待，严格地要求自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教书时告诫自己不能误人子弟，现在行医同样不可坑人钱财，希望在这有生之年还能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何先生的奖牌和证书



何先生填词的养生歌
《养身莫延迟》

如南瓜、鸡蛋等来谢恩。他一生不求财，不求利，不求名。一个中医的人生信仰会直接影响他的医术，如果爷爷执着于金钱，执着于名利，他就无法做到在医治病人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

从我记事起，我和父母已回到了顺德，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家里人丁兴旺，爷爷生养了13个孩子，在他60岁时就已经有了8个孩子，大老婆去世后，又娶了一个20多岁的姑娘做我奶奶，又生了5个孩子。生最小的叔叔的时候，我爷爷已经71岁高龄了。在上个世纪初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我爷爷依然精力旺盛、精神饱满，这与他比较注重中医养生是分不开的。让他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他13个孩子都无意从医。可能是隔代遗传吧，我经常看着爷爷给病人诊病，逐渐对

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喜欢和爷爷在一起，喜欢看他帮人看病。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判断出病因病情，这对小小的我来说是多么的神奇。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我很小就认识了很多种中草药，并大概了解了它们的性能与用途。由于小时候记性比较好，一种草药只要听爷爷讲解一遍，就基本记住了。7岁时我上学了，放学后一有空我就到爷爷的诊室，看他为病人诊病，听他讲医经。爷爷也有心培养我，他的医学藏书任我看，还让我背下来。

1964年，我16岁，初一还没念完就辍学了，家里经济状况也大不如前，父母不懂干农活，父亲干脆不去做。母亲体弱多病，不能干农活，只能做点纸工艺换点生活费。勤劳贤惠的母

亲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母亲也是我最敬重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半夜发烧，羸弱坚韧的母亲凌晨三点背着我，黑灯瞎火地深一脚浅一脚，整整走了2个多小时，才到大良医院，还好前面排队人不多。如果去的晚了，就要等很长时间，可能到每二天晚上才能回家。我是家里长子，下面还有3个弟弟妹妹，辍学后，我自然就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耕田种地、劈柴担水、照顾弟妹、家务农活我都要做。同时我也在学医，经过几年系统地学习后，我开始给人看病抓药了。

同年的下半年，村里新办了学校，非常缺少老师，村领导就安排我去教书，我虽然热爱医学，但还是听从领导安排到学校教书了。从此我就跟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我一边教学一边继续深造医学。

我的初一学历在当时算是高的了，学校便指定我教初中毕业班语文。那时的初中只有初一和初二，也就是说初二就是初中毕业班了，我可是连初一都没读完啊。学校也考虑到这一点，安排我到顺德师范进修半年，主要学习实践性教学课程。





由于我平常也喜欢看书，有比较扎实的语文基础，教语文我还是能应付下来。当然，我不只是应付，几十个孩子的后半生命运可全托付在我身上，自然不敢掉以轻心。虽然我的学生有的和我差不多年龄，但我的沉稳和自信与这些稚气未脱的学生，还是拉开了一段距离。我想我的这种成熟自信的气质，应是得益于中医爷爷对我的熏陶。在学校，我身兼两职，既是老师，又是校医。

作为老师，我总是想把自己懂得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并且还主动积极地去寻求未知世界，探索新的育人规律，搜集资料、整理分析资料、设计教学方案、撰写报告或论文以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使局部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的理论。我相信我的努力付出不会白费，果然天道酬勤，初战告捷，我第一次带的毕业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了，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

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从而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

1966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那时，我家里有两大书柜的医书，由于奶奶胆子小，怕说这些书是四旧，所以就想全部交出去。我背着奶奶偷偷地拿了一些有用的书出来，在墙上拆出几块砖来，把书藏在墙缝里面了，才得以保存至今。文革期间的教学内容以德育为主，同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育主要是学政治、学毛著。教师和学生还要从事农业生产。虽然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但是“学政治”已经摆到了学习的

第一位。文革过后，恢复了高考，教育重新被重视，开始步入正轨。学校让我去参加了中文大专进修班，而我更想做一名专职医生，但我只能二选其一，医生是我的最爱，靠它养不起家。后来只有选择继续教书，三年后我完成了中文大专的学业，拿到了中文大专毕业证。

寒来暑往，不知不觉经我手迎来和送走了很多批学子。转眼已到了1990年，这时我已42岁了，这一年我被聘任为中学正校长，且还是兼校医。我虽喜欢医学，但我知道，没有取得医学资格证书是不能独立行医的。我毅然决定，马上报考全国中医高等自学考试，需要考13门课程，并且还要有3年的临床经验，



经临床考试合格才能发毕业证。我下定决心，保证自己45岁毕业。记得当时单是广东省就有4000多人参加自学考试，有些屡考屡败，只好放弃了考试，最后只有100多人毕业，我有幸是其中的一个。每一门学科我都是一次通过，从没补考过，后面临床也顺利通过了。终于，我如愿以偿在我的预期内拿到了中医大专文凭。

我认为，中医是以阴阳平衡论健康的，它是我们的祖先根据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总结出来的。因此，中医的平衡论适合一切事物，一个人阴阳气血失衡就会生病。一年中如果大自然的气候过冷过热，雨水过少过多，就会发生风、雪、涝、旱等灾害。一个单位如果做到公平公正，人人平等，就会化解很多矛盾，增强单位的凝聚力。一个国家如果贫富太悬殊，权力和财富过分地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底层贫穷的人太多就会造成社会失衡，矛盾越来越多。如果世界各国之间失去制衡，就会发生战争。因此，我认为中医的阴阳平衡论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它不但可以用来治病养生，还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做人，甚至治国平天下。

前面提到过我父母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我父亲70岁时已是膀胱癌晚期，每排一次尿都痛不欲生，排出的都是瘀红的血尿。各大医院都拒绝治疗我的父亲，因为他们无法止住我父亲尿血。可怜的父亲被病痛折磨得已不成人形，妈妈开始为他准备寿衣，弟妹们也去店铺订购棺材，一切后事都准备好了。我不甘心让父亲就这样等死下去，于是我就决定自己来治，治疗时也是运用了阴阳平衡论。我给父亲开了扶正清热解毒的中药，当然扶正的药占主要，只要正气扶起来了，一切自然就向好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喂药，父亲已是昏迷不醒的状态，是我们几姊妹合力把他的嘴巴撬开，才喂进去一点中药汁。隔了一会又给他喂米汤水。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奇迹出现了，父亲的血尿慢慢减少，也可以自己张开嘴喝药了。等血尿完全止住了之后，我考虑到父亲排出大量的血尿，身体损耗大，急需补充营养，我就换了健脾胃的中药给他服用。“胃乃后天之本”，也就是说，只有胃、肠功能正常，吃进去的食物才能转变成血液。半年之后，父亲恢复如常。经过此劫，父亲的心态好了许多，他开始以平和、宽容、积极的心态迎接每一天。直到10年之后，也就是他80岁那年，由于大腿骨折，可能是老人的免疫力差，身体各项机能退化，很快引起膀胱癌复发，这次可是来势凶猛，膀胱大量出血，尿和血液已凝结成块不能排出了。在医院，经验丰富的范医生给我父亲做手术，看到父亲的膀胱皮已薄如蝉翼，他说：“我行医几十年，头一次见到这么薄的膀胱可以支撑他活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奇迹。”然后，范医生马上又为我父亲缝合上刀口，他说：“做手术已毫无意义，随便动一下都会要了他的命，只有采取保守疗法。”没多久，我父亲就离开人世了，但他带着癌症延长了10年的寿命。

其实，中医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神乎其神，中医讲的是天人合一，辨证施治。人的身体与气候的相关性，是相当密切的。了解了这一点，大体上所有的病都能找到切入点，即使是疑难杂症。

记得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一个同事的岳父（是抗日二支队的老革命）得了一种罕见的病。他的肚子内长了一个肿块，大便拉不出来，肚子胀鼓得发亮，经县镇各医院治疗后仍无效果，包括县城有名的医生说治疗这个病没多大希望，没办法只有把病人拉回家。我的同事找到了我，一定要我去看看他

的岳父。下午放学后，我抽了个时间去到他岳父家里。病人就放在大厅，他的眼睛都是闭着的，肚子胀得像玻璃一样透明，手脚发黑。可怜的老干部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也不敢答应医治，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病人家属苦苦哀求我试试，这时村干部也来看望这个老人，他们也加入请求的行列，一定让我试试，死马当活马医，还担保就算是经我医治后死亡也跟我没关系，我只好答应说治治看吧。我向病人家属说明我要开的药方里面有一味是毒药，以毒攻毒方能取效，要求病人家属全部签字，同意用我这个开有毒药的方子治病。我把方子开了，让他们去照方抓药，然后我给病人按摩肚子。

第二天一早，他的女婿看到我很激动地告诉我说，那药很管用，他岳父服了药之后，一个晚上就拉了5次，肚子鼓胀已经消下去了，今天还可以吃点稀粥。我知道治对路了，又连续开了几服药。半个月后，老干部自己上街去理发了，身体已恢复如常，经检查腹内的肿块也消失了。他的家属十分感激，一定要送我红包和锦旗，我婉拒了，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

现在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不少，就顺德来说，整体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执政党，可能有人说我是唱高调。如果你了解历史，就很清楚，在短短几十年的光景，就可以让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令人羡慕的世界强国，恐怕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党派能做得得到。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是坚硬的木瓜树皮、苦涩的芭蕉头、难以下咽的糠菜团子，那时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要吃不死人就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3亿人口的大国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现在我国也是军事强国，世界

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敢欺负我们，中国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历史中是少见的，从这方面来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

我现在退休了，很多人都劝我颐养天年，我反而觉得我现在要做的事更多。况且，静止是中医养生的大忌，我要求自己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现在开这个中医养身馆，也是希望我能更多地为人们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除了给人看病，我的业余生活也相当丰富：唱歌（粤曲、革命歌曲）、练书法、练气功等，看起来我一天都没闲着，实际上这些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做就乐在其中，快乐的工作会给人带来青春的活力。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会认真地对待，严格地要求自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教书时告诫自己不能误人子弟，现在行医同样不可坑人钱财，希望在这有生之年还能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甘竹滩畔的青春

何惠群口述 周美华整理

人生在世一辈子，总要让青春之歌写出一两首经典，才不至于遗憾吧？群姨有了“群”舞飞扬的那段岁月，于是她的青春被定格在那里。每每说起那段历史，她都像又回到了十八岁，也因为这些珍贵的回忆，让她保持着十八岁时的那份积极和乐观。

今天要采访的主人公叫何惠群，大家都叫她群姨。群姨很乐观，心态好，身体硬朗，中气十足，说话声音清脆响亮，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我们一见面还没来得及问，她就主动把她的过去跟我们娓娓道来。

群姨今年63岁，1963年她才13岁就参加了工作。是街道办的集体企业，刚开始是在永丰拆贝厂(现东城酒店对面)取贝肉。这个厂上班时间是固定的，出海的船什么时候回来了，她们就什么时候上班。经常是凌晨两三点睡得正香，就要从睡梦中爬起来。那时马路上没有路灯，也没有手电筒，晚上都是点煤油灯走路。为了省点油，有时上夜班也舍不得点灯，就黑灯瞎火地赶路。而且在她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疯人院，经常会听到一些恐怖的声音。有几次走到半路，还碰到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让她惊吓不已。后来为了她的人身安全，每到夜班时妈妈就会陪着她上下班。尽管过着那种黑白颠倒的日子，不谙世事的她也觉得很开心。但令她记忆最深刻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去支建，就是去支援建设顺德最大的发电站——甘竹滩洪潮发电站。

甘竹滩电站位于大良南国路西20余公里，西江支流的甘竹溪。西江主河道与甘竹溪相连，因甘竹溪流经此处，故有此称。昔日甘竹滩，“滩石奇耸，声如雷霆，江水、海潮互为吞吐，邑之巨观”，素有“甘滩雪涛”的美誉。甘竹溪入口多礁石，成为险滩，普通洪水位平均落差就有将近1米，退潮比西江干流快，所以就形成落差。是船难多发地，以前曾流传“甘竹滩，鬼门关，船过要沉，艇过要翻，鹅哥飞过要兜弯”。据说因为航道危险，抗战时期，日本军队都不敢轻易进入甘竹滩。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当时的顺德县政府，为了解决全县60%的用电量，变险滩为通途，决定动工兴建甘竹滩洪潮发电站。由于工程浩大，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就从街道办的各个企业里，抽调部分人员去支援建设。大家都知道支建工作是很苦很累的，所以很多的人都不愿意去，而群姨却自告奋勇地报名去支建。背后别人都在议论她：“不知她是傻呢？还是想出风头想疯了？”当时她并不理会别人怎么说，一门心思要去支建。

就这样，18岁的她背上简单的行

如今的甘竹滩水电站



装，踏上了甘竹滩。来自顺德几个公社和几个镇约几千人的支援队伍，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建站开工仪式。她还记得当时在开工誓师大会上，人们高呼的口号是：“誓把吃人滩变成幸福滩！”，回想起来，那时的激情和热情现仍历历在目。

誓师大会的第二天，甘竹滩洪潮发电站动工兴建开始。她毅然地和其他人一起，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凭着“敢为天下先”的顺德精神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建设浪潮中去。

她分到的工作竟是去山上采石头，要强的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每天两到三个人推着大板车走十几里的路，上山去打石子。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女，满头大汗地抡着铁锤，拼命地敲打着石头，一天下来满手都是血泡，她却连吭都没吭过。石头打下来还不算，还得把自己打的石子，一箩筐一箩筐地从山上慢慢背下来（一箩筐石子有六七十斤重）。这样每天要往返数趟，肩膀也肿了，腿也软了，脚也起泡了。这还没做完呢，还得自己把背下来的石子用推车推到工地上，再帮石匠砌大坝。当时没有大型开挖设备，全是靠人拉肩抬。没有水泥搅拌机，石子和水泥就靠人用竹棍搅拌，一袋50公斤重的水泥和一定配比的石子，必须5分钟内搅拌好，非常的辛苦劳累。当时，大家都很会苦中作乐，很喜欢唱“甘个河水水流长，左滩右

滩红旗飘扬……”这首歌，干活的时候唱，开心的时候唱，很累的时候也会唱。唱起这首歌就会觉得豪情万丈，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每天劳动下来，整个人都跟散架似的，全身到处痛，晚上回到工棚里，大家都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了，也有些人打了退堂鼓，但群姨还是强忍坚持下来了。

她们住的是临时搭建在发电站附近平地上的工棚里，一个地方的工友住在一个工棚里。那时在工地干活又累又苦，生活条件也很差，平常煮饭，刷牙，洗脸等生活用的水都是红色的，水里面有红泥。她们都是先把水装在桶里，沉淀几个小时后才来用。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但她们每月都有十几元工资，够买饭票吃饭。不但能吃饱，偶尔还能买点糖、饼(光酥饼、油煎饼)之类的打打牙祭。



就这样，凭着大家的苦干实干，一座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发电站，于1974年全部投产。在其鼎盛时期的70年代，它装机5000千瓦，一年发电1400万度，相当于当时整个顺德一年的农田排灌和鱼塘抽水的用电量，当时对顺德农业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甘竹滩洪潮发电站1978年还曾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还荣获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题字。



如今的甘竹滩水域依然山清水秀

回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建设的主要工具就是钢钎、铁锤、竹杠、竹筐等等。水电站建起的27米高的大坝和厂房全部靠的是人工。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那种“人海战”的建设场面早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钻机、挖土机、推土机、运输机、搅拌机、塔吊机等一批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机械设备，其效率是人工作业的成百上千倍，真让我们这代人羡慕啊。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甘竹滩洪潮发电站静静地屹立在西江甘竹溪支流上。时代变迁，风云变化，这个当年全国落差最小微水头发电站的发电功能日渐势微，但没有改变的是当年的秀丽风光和鲜美的甘竹滩水鲜。由于甘竹溪水质清澈，远离工业矿区，十分适合河鲜生长，很多鱼儿都喜欢聚集在大坝附近“休养生息”。在如此优良的水质中生长的鱼儿特别鲜美，为了品鲜每天都有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

2002年群姨从凤山鞋厂退休，现在每天都过着清闲的日子，平时会跟以前的同事相约饮茶叙旧，有时也会去甘竹溪品鲜，实质上是顺便看一看当年亲自支建的水电站，也更是为了回忆支建时的那段岁月。回想起来，这是她成长路上最开心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

岁月无痕

李阿姨口述 周美华整理

草木荣枯，日月轮回。走进岁月的深秋，沉浸在漫无止境的夜色里，感受着风在冷冷拂过，肆意地摇曳着，并轻轻地吹乱了我的发梢。当我记忆的闸门慢慢打开时，过去的事情犹如潮水般涌来。

解放初期，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大家工作虽然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虽然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我们同样对幸福生活充满向往。那时有两首坊间最流行的民谣“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这就是中国50年代大部分地区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的大良到处都是瓦砾沙石，锦岩庙也是一片烂地。在生产队时，我什么脏活、苦活、累活都干过。修建发电站时去义务担过沙石，天天要走路去顺峰山做工。当时女儿还小，只有2、3岁的样子，也没人帮忙照顾小孩。所以，我每天很早就得起来，匆匆忙忙胡乱吃点早餐，背上女儿走十几里路去干活。劳动工具还要自带，连午餐也是自己掏1毛5分钱出来搭食。现在想想那会过的真是太辛苦了。后来还到过顺德丝厂做了3年工，文化大革命时被下放到乡下供销社做了3年，返城后就去了爆竹厂。

在爆竹厂做工，要先从学徒做起，做学徒时每个月是6元工资，但也拿不到现钱的，都是发给我们饭菜票作为抵扣，要等到出师之后才能挣工资。记得第一天去上班，由于没掌握技巧，所以做起来既慢又笨拙。做到上午十点了，一看，我还没

有做够挣2分钱的活，可中午的饭钱就要7分钱。做了半天连一餐饭钱都没赚到，想到这我一急就哭了。几个同事可能跟我有同感吧，相继也跟着哭起来，搞得那个主任都不知要安慰谁了。当时为了养家，我每天只买2分钱一份的茄子，外加一碗大白饭。把省出来的饭菜票卖给别人再换成米，以接济家里的不足。偶尔有生孩子的同事请吃姜醋，按当时的行情是要封五分钱利是，每次都吃得我心痛，这可是我半天的工资啊！就是这样苦苦撑了三年，总算转为正式工了。这时的工资就大幅提升了，每月能领到32.7元了。

那时爆竹厂的活多、会也多，晚上经常要去开会。有一次晚上背着女儿去九眼桥开会，我生来胆小，外面又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虽然心里头怕得很，可我还是硬着头皮走出去。路的两边是甘蔗林和菜地，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前面有一闪一闪的亮光，应该是一个男人在那里抽烟吧？但我害怕得心都跳到嗓门处了，就故意大声叫喊着“大嫂，大嫂，快跟上来啊！……”，以此来给自己壮壮胆量。

还有一件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爆竹厂动员我们去拆金色庵。在民间来说，拆寺庙和菩萨是会受到惩罚的。这庵在外村街，里面住着五府师姑，由于她是走资派，这个屋要充公，于是就派我们去把它拆掉。不知是天公好德还是我运气好，那会我正好发现怀孕了，就获特批不用去参加了。不但不用去，而且工厂还安排我吃了4个月的孕妇餐（每顿可以有一两片肉或者一个鸡蛋或者一块鱼），这不仅让我逃过了一劫也让我免受良心的谴责。去的人要运煤运粮，逢山翻山，逢水涉水，反正后来看到有参加的人结果都挺惨的。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是否真有神灵存在，或许是当初那个年代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动荡的社会造成的后果，唉，反正解释不清。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毛主席又提出。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赶英超美的口号，所以我们国家就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随后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

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外行内行，只要是人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城里没有树木，就烧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砸锅子和各种铁器；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庙宇，毁围墙、宝塔。往常宁静的学校也沸腾起来了，学生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近高炉，常年操持家务的妇女也出去炼钢。我也不例外，来大良炼钢，很艰辛，而且还吃不饱，又把自家的铁锅铁锄等都送作炼钢的原料。虽然我们都心甘情愿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但是由于原材料和设备等不合格，工艺又不成熟，炼出的钢也就基本上全是废钢一堆。

那些年吃又没的吃，穿也没的穿，住的地方更是紧张。记得自我结婚起到现在搬过9次房，搬得勤并不是有钱买房，前几次都是我家成员越来越多，房子破旧不堪，有好心人关照，把他们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在我还没生小女儿时，我带着三个女儿和另几家一起挤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这间小房一共住了14个人。我和几个女儿睡在通道上，不等天亮，里面的人出来倒尿壶，我还得揉着惺忪的眼睛爬起来让道。有时累了一天，真的是不想起来，就使劲地往里挪动，将几个女儿都挤得哇哇大叫。我赶紧小心翼翼地坐起来，爱怜地哄着她们，看着孩子们憨态可掬的睡相，偶而也会忍俊不禁。生活虽然困苦，看到孩子们在慢慢地成长，心里也就有了一种安慰，我就会更加劲头十足地开始了新一天的劳动。

说到孩子们，也都是苦过来的人了，但我都是尽我所能让他们感觉到我对他们的关爱。去干体力活时，自己宁可饿肚子，也要留一半饭回来给孩子们吃。那时，若能吃上一个完好新鲜的苹果，对我们家来说也是很奢侈的。记得二女儿曾对我说过：“妈妈，什么时候我能吃上一个不烂的苹果啊？”听了这话我双眼濡湿，女儿啊！我也想给你吃好的苹果啊，可是你不知道，好的苹果要七毛钱一斤，烂的苹果只需2毛5分钱一斤啊。衣服也没钱买，等到过年的时候，每个孩子才做一套新衣服。我记得我自己足足七年没有穿过新衣服了，一个亲戚从香港给我买来件新衣服，我也没舍得穿，给大女儿穿了。

后来我们是租房住，屋顶都掉下来了，也没有钱去修。那时还没通电，点的是煤油灯。有一次女儿点灯不小心烫伤了手，当时就烫掉一块皮，女儿忍着痛没哭，我看着倒心痛地哭了。没隔几天，我一咬牙，去向领导借了45元钱，托人从武汉买回一个电表，装上电灯，这样总算不用再点煤油灯了。借的这45元钱，让我省吃省用整整还了一年。那时也没有自来水，要喝水都得去现在的人民医院附近的井担水喝，其它地方都打不出水来，所以那时用水犹如用油。房子只有20平方左右，一家大小都挤在里面，厨房只有在外面临时搭建了，下雨天，洗菜洗碗就淋得像落汤鸡。单位也不给我们配房，因为是私家户口，没有房分。看着孩子们越来越大了，日子过的真的很难，我就写申请，找领导，求爷爷告奶奶的，最后街坊九叔将二楼扩大到三间房，让给我们住了一间，这样才得以维持过日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顺德被列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城市。

丈夫也坐上了改革开放这趟车，从韶关调回到大良农机二厂工作。他的单位马上就给我们分了一套一厅三房的福利房，还没等外面设施完工。我们就急不可耐地趟着齐膝深的泥巴浆子搬进去住了，这可是我们梦寐以求多年的房子啊，现在终于住上了。而且设施一应俱全，水电无忧，再也不用担水喝了，已经长大的孩子们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此后家里的生活慢慢的发生着变化，我和丈夫的工资也不断上涨。孩子们也相继参加工作，有了自己的一份收入并可以补贴家用。后来社会上物资供应越来越丰富，家里的衣物家具也一件件添置起来，颜色也鲜艳了。我们一家人经常会出去散散步，打打球，开心的时候还会在家里放音乐，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每天感觉像生活在梦里。这一切的改变让我打心眼里感谢邓小平主席。

现在，我和老伴（现80岁）住在女儿为我们买的新房子里，我们两个都有退休工资，而且老伴满80岁了，又增加了一项老人津贴，我也很快要加了。其实儿孙们每个星期都会为我们准备好日常用品送过来，我们几乎都不用掏钱买什么东西。孩子们都很孝顺，到了周末都要和我们聚一聚，享受这种天伦之乐。有时我还像小孩子似的喜欢过周末，盼望那种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和谐气氛。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衣食住行变化真是太大了。现



工会证和退休证



在人们不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住房装修像宾馆，有的装修一套住房要花上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比五星级宾馆还要豪华。三人两个卫生间，以前整座楼才一个公用厕所，现在家家有卫生间还不满足，还非要多出一个。一家几台大彩电，免得家人争频道。家家上网有电脑，世界显得更渺小。出门跟着轮子转，以车代步真舒服。电话装在兜里边，移动电话已不是“大款”身份的象征，连收破烂的蹬三轮车的甚至普通农民都是人手一个。款式从越来越小变成现在的越来越大，真是不可思议。来了客人不做饭，一般都要上饭店。买车买房敢贷款，提前消费很坦然，一切的一切，真是今非昔比啊。

贤妻

冯太口述 周美华整理

贤妻这个词因一部电视剧悄然地流行于我们大家的口头。而中国的女性，都以贤妻来要求自己，贤妻才是完美的女性形象。可真要问何谓贤妻，恐怕大家也回答不上来吧。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女主人公的故事，相信她可以给你最好的答案。

她是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客家女人，大家都叫她冯太。她今年77岁，1936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大埔园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现和老伴住在新松社区的一个小区内。他们共有四个女儿，现已全部成家。

她生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的家庭环境都很贫寒，基本都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读书的人比较少，作为女孩子的她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着帮大人做些家务活。到十六七岁时，已经会干很多活，挣钱贴补家用了，像养蚕、养鱼、种甘蔗这些事情她都会做，而且做得很好。

五十年代时，村子里办了夜校，义务教学生，不收钱。她就天天晚上抽出时间，去夜校听老师讲课，不知不觉也就学会了好多字。后来又去读了半年幼师教育，村里面就安排她去幼儿园当老师，这也算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人生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只要永不懈怠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前面就是幸福的彼岸。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和丈夫相识是她嫂子介绍的，她丈夫是均安人，当时他是由部队分配到大埔园兵役局工作。她嫂子看她丈夫人品好，就介绍给她，相识了几个月，他们就结婚了，那时她才22岁。

1963年，国民党叫嚣着要“光复大陆”，边防局势突然又变得很紧张，刚刚结婚三个月，丈夫就回到部队了，她就搬到了均安乡下婆婆家。由于风俗习惯的差异，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尤其是语言不通，她在均安住得很不习惯。婆婆这边生产队里的很多农活，她以前都没有做过，像割草、摘桑叶、割水稻、插秧等等。这些活她刚开始做感觉很累、很辛苦、又很慢，总是跟不上人家的进度，所以哪个小组也不愿意让她参加。干活慢，完不成任务队里还要扣工分。好在她丈夫是部队军官，中尉军衔，工资也相当可观，所以扣工分也不太在乎。只是她丈夫的工作单位离家里很远，通常要一年或者半年才回一次家，每次回来只能呆上两三天，根本照顾不了家。所以家里的所有事，也就理所当然由她承担起来了。

1974年生四女儿时，依然没有好的交通工具，还是她大伯骑单车，把她送到医院里面去的。直到孩子半岁了，会爬了，她丈夫才回家，看到孩子后很惊讶：怎么又多了一个孩子？那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通信和交通都不方便，以至于丈夫不知道自己又多了一个孩子。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可以分担，每天都要起早摸黑干农活。白天把孩子放在生产队的托儿所里，晚上收工后再接回家，伺候孩子洗漱睡觉，每天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受了委屈，自己偷偷地躲起来哭，哭完擦干眼泪站起来，照旧过日子，一晃在均安待了整整26年。

直到1989年，她丈夫调到大良市政府工作，她们全家才随

迁到大良居住，总算结束那种两地分居的日子。慢慢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她又开始帮忙一个接着一个地照顾外孙儿。人老了没事做有小外孙在身边觉得也很开心。本以为总算苦尽甘来，可以享享清福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06年丈夫突然中风，她因此受到惊吓，落得个手抖的毛病。丈夫中风后行动不便，加上无法接受这个病情事实，心情沮丧，很苦闷。她每天还要抖着双手，帮助丈夫做一些康复运动，在丈夫情绪不稳定时，还要想方设法地安抚他的情绪。

她没有退休金，为了省下那份请人护理的佣金，她只有自己拖着年老的病体来服侍丈夫，帮丈夫洗澡擦身、肢体按摩、喂饭洗衣、扶着散步等等，如今，她已服侍了整整七年。丈夫在她的精心照料下身体恢复得很好，这么多年感受着她对他的关爱，心情也平和了很多。她默默地陪着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无怨无悔。她用自己整个生命的爱感化着丈夫，给丈夫支起了另一片天空。他们相濡以沫，白首不离，正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日子过的虽然很苦很累，但是她的心情却越来越舒畅，孩子们都很懂事，每个周末都会回来看望他们，还有政府和社区也经常派人上门探望慰问，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如今她感觉生活得很好很满足，每天她都带着微笑，从容地面对着人生旅程上的风风雨雨。

冯太这个平凡的女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她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最朴素的爱，用一生的奔波劳碌，让家庭充满温馨与和谐。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坚忍和贤惠，不正向我们诠释了一个贤妻的标准吗？她就是一个难得的贤妻，她的事迹感动着身边的许多人。

文革中的二三事

周文璇 口述 张海芳 整理

文革中的几件事情，我是以一个见证人和参与者的角度，从本人的工作经历和生活侧面来写的，虽然无法纵观“文革”的全部与整体，但也可以管窥一斑。现在我很想把这段往事讲出来，以警世后人理性做人做事。

我叫周文璇，生长在广东省的一个小城镇顺德。文革开始时，只有20岁，可以说是个涉事不深的小姑娘。当时谈不上对文革时期的风起云涌有多少了解和认知，但毕竟有过一段经历，现记录在这里，用这段不能忘却的记忆，启迪后人和反躬自省吧。

196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历史性的年份，就是在那一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它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以狂风暴雨之势，席卷着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当时我是综合社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女子，天生爱唱歌爱跳舞，所以被推举为代表。代表就是代表综合社参加各种活动，比如各种会议、各种学习班、各种宣传队、各种批斗会、各种文艺演出等等，还要上传下达各种革命精神，从而深切体验到了文革时的狂热。

作为综合社的年轻人，我每天除了和母亲一起裁衣服外，还要排练样板戏、跳忠字舞、唱革命歌曲、背诵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等。文革期间的人，几乎人人都得背“老三篇”和“红宝书”，对于我这样的小代表来说，它就更要像血液一样融化在我的身体

里，张口就要背出。所以，至今时隔四十几年，我依然能流利地背诵。

跳“忠”字舞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真的难以体会到文革时期的荒谬和狂热。当时我所在的街道有三个派：即学生组成的主义派；工人干部组成的工人工会；普通工人及综合社的社员组成的红旗派（我就属于红旗派）。现在的华盖路步行街是当时大良镇的主要通道，是红宝书和宣传车的必经之地。道路两边搭满了工棚，作为三个派别的集中点，街道两边也被三个派别贴满了大字报。每天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三更半夜，狂风暴雨，只要红宝书一经过，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三个派别的人全部都要在街道两边列队迎接，连夜举行游行活动，游行的口号是：热烈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每次就这样不分日夜，穿街走巷，敲锣打鼓，高呼口号，还要跳千人一面的“忠”字舞。

那时是家家户户、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都在跳。大街小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男女老少们都在跳。回想起来真是种奇特的现象。而且人们跳时表情也都是兴高采烈的，可以说是载歌载舞。现在的年轻





人有很多不知道什么叫“忠”字舞，代表忠字舞的歌名就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那时的人们把领袖已经神化了，早上吃饭前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时要唱《东方红》，晚上吃饭前向毛主席像汇报一天的工作和学习时要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平时有活动时就唱得更欢了，连唱带跳就是“忠”字舞了。当时觉得很热闹很刺激很疯狂，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无知，很愚昧。

那时我们每个月都要去凤岭山的文化站也就是现在的凤岭公园开会，所谓开会也就是唱红歌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所以千万不能迟到，迟到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轻则被处罚，重则被打成反动派，然后整天被批斗。我们综合社有一个精通雕刻的社员，叫王道友（谐音），王道友是当时极尊贵的人物，很有才华，会雕刻公章，会写大字报，各个派别的人都找他抄写大字报或雕刻。有一次，他迟到了，那天他匆匆赶到会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再加上他本身就有哮喘的毛病，站在门口喘得很厉害。大家虽然知道他是为了帮别人才迟到，也知道他有哮喘病，但仍然要惩罚他，如不惩罚他就

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所以大家异口同声地让他唱一遍指定的红歌。他一点也不敢抵抗，就气喘吁吁地大声唱起来，他唱了半个小时也没有唱完，脸早已憋成绛紫色了。我当时虽然于心不忍，也要装着和别人一样起哄折磨他。好在后来大家看到他这种情况，歌没唱完就让他停了下来，我赶快扶他坐下，并给他倒了一杯水喝，来稳定他的哮喘毛病，也借此减轻一下自己的罪恶感。

知青下乡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于我在宣传队工作，所以不用下乡。那时，我还有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挨家挨户动员别人下乡。工作没有多大的难度，每个人都很听毛主席的话，满十六岁之后都会自动请缨下乡。那时，准备下乡的青年都站在大卡车上，在震天的锣鼓欢送声中，前往在前途未卜的农村。当时我弟弟也是其中一员，下乡到杏坛银华大队养鸡、养鱼。那时村里面给知青搭了草帐篷。我弟弟把草篷让给村里面的人放工具，自己去村长家和村长的儿子一起住。当时弟弟



不懂事，把村里分给知青种的地当成篮球场，带着村里面的小伙子们一起打球，玩得不亦乐乎，鱼塘、鸡场的工作，基本都是农民帮他们做的。当时的农民非常淳朴，很乐意帮助城里来的孩子，一到过年都替孩子们上缴劳动成果。直到现在我弟弟还与当时的小伙伴们有联系。他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年。经过十年的锻炼，他现已经是个养鱼专家了，不仅会养鱼还会给鱼治病呢。

那年动员别人下乡时，遇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有年迈多病的父母和一双女儿，大女儿已经下乡了，小女儿在家照顾父母。本来像这样的家庭，按当时的政策是她家小女儿属于身边子女，不用再下乡了。只因为她家前几辈是地主，故要惩罚她，非让她小女儿也下乡不可。党支部派我到她家做动员工作，我到她家之后，给她小女儿做思想工作，要她听毛主席的话，做党的好儿女，下乡去锻炼锻炼，做一个有作为的年轻人。她的小女儿很刚烈，就说：“按党的政策我属身边子女，不需要下乡，要在家照顾父母。如果一定要让我去，我就去撞死。”其实，她家的遭遇我也非常同情，本就不忍心去动员她，之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到现在我都很庆幸，我当时没有逼迫她，否则让她走上不归路，我这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20多年前的老街坊



20多年前的老街坊

批斗大会

在文革期间，我和所有的人一样狂热地投入，也会去参加各种批斗会，但是我却从没有故意迫害批斗过他人，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那时批斗会的方式就像演戏一样，先是主持人大喊“把走资派某某某押上台来！”，然后两个戴袖章的红卫兵把批斗对象一溜小跑地押上前台，还用手使劲反掀他的手臂，让他低头弯腰到最大限度认罪。被批斗的人脖子上都挂着木牌，上面写着“某某走资派”，然后发言人轮流上台进行批判。有人在发言当中还不时地呼喊口号，说到动情处，还要去踢走资派的屁股和按走资派的头。台下也有人领呼口号“揪出某某某！”、“火烧某某某！”、“打倒某某某！”、“砸烂某某某”等等。口号声震耳欲聋，火药味很浓。批判发言完毕，由被斗人交待问题，承认错误，回答革命群众提出的问题，完了，还要给戴高帽子游街。回想起来真是荒谬绝伦，让人不寒而栗。而且经后来查证，当初很多被批斗的人都是被冤枉的。

曾经我因同情一位善良的被叫做布拉肠（谐音）的地主，受到别人的排斥，但是，我至今都没有后悔过。

以上文革中的几件事情，我是以一个见证人和参与者的角度，从本人的工作经历和生活侧面来写的，虽然无法纵观“文革”的全部与整体，但也可以管窥一斑。现在我很想把这段往事讲出来，以警世后人理性做人做事。



宣传队下乡



标准造型



農村 居民

逝去的青春

杜带彩口述 刘细霞整理

时间，随着车轮一直向前走，蓦然回首，我的青春早已远去。转眼之间，风风雨雨走过了80多个年头，逝去的那些美好年华，是沉浸在辛酸苦难中的，这些早已被我封在了永恒的记忆里。

我叫杜带彩，在家里我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很小我就负责照顾弟弟们。

抗战时期的某一年，当时我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有一天我带着两个弟弟在家门口玩，忽然听到远处有人在喊叫：“姑娘仔，过海！”我探头一看，是几个穿着军服的日本兵，都扛着长枪呢，原来是日本仔进村了。当时我姑姑也在家，她连忙叫我带着两个弟弟回屋里躲起来。只见她马上去撑船，渡日本仔过海(当年顺德是水乡，到处都是河，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一艘小船，叫艇仔。这里的海指永丰桥下的那条河)，撑完船之后，姑姑就跑远处去避枪靶了。听大人讲日本人当时非常的猖狂，他们想吃鸡就杀鸡，想要什么就抢什么，还烧了很多房子，那火通通地烧，半边天都映红了。在很多村子里听说都有人被杀，反正日本仔一走，村里到处都是哭声喊叫声。

在我12岁的时候，就经常要挑着箩筐出去拔草，拔一天草可以换回一斤半的大米。那时我们是没有干米饭吃的，都是拿很少的一点米去煮一大锅稀粥，然后里面再加些野菜，就这样吃。我妈他们每天都是去给人家挖坑割草换粮食，可每天也只能拿回来一点米和少少的一点番薯。

有一件事情让我想起来就心痛悔改，我害死了自己的亲弟弟。有一天，我妈妈被人家叫去割草，爸爸带着我弟弟他们去茅屋那边，我就在家里。爸爸临去前特别交待我，第二天从埋在家里地下的小瓶子里拿一点米带去茅屋那边，好煮粥给大家吃。到了第二天，下着很大的雨，所以我就没有及时赶过去。爸爸左等右等不见我去，两个弟弟又一直吵着肚子饿。万般无奈之下，爸爸就在茅屋附近找吃的，找来找去就捉到了几只蟾蜍，当时爸爸也没有什么常识，不知道蟾蜍是有毒的，就把蟾蜍杀了煮成汤让大家吃了，结果没过多久他自己就晕过去了，一个小弟弟被毒死了。事后，全家人都责怪我害死了自己的亲弟弟，我也非常地自责，天天晚上都会做恶梦。那段日子精神和心灵上的折磨都快把我逼疯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慢慢淡忘了这件事，我才缓过来，可这个阴影一直伴随着我的一生。

20多岁的时候，经人介绍我嫁到了新松这边。记得当时男方只给了2千斤米谷当作礼金，就可以迎娶了。由于我们两家都很穷，也就没有什么讲究，结婚仪式非常简单，男方安排

了一个人撑着船到永丰接上我。记得我那天就穿着一件“云绿里”和一件“大胜南”做嫁衣。虽然衣服很土，却是我长这么大唯一的两件新衣服。我穿在身上，比现在的新娘穿婚纱还要兴奋和激动呢。就这样我跟船来到新



我的嫁衣

松。下船后有个大妗姐（广东婚嫁习俗中的被作为新嫁娘的“守护神”，是婚庆场合女家用以跟随新妇的临时使妈）带着我进入屋内倒倒茶就算礼成了。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就这样简单完成了，从此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1958年真是苦年啊，那时都在搞大跃进，大伙一起出去做事，吃的是饭堂的大锅饭。那时我独自带着五个小孩子，出工时就把小孩们都放在幼儿园关着，晚上吃完饭再接回家睡就行了。那幼儿园现在还在呢。如今我也算含辛茹苦地把五个小孩都抚养成人了。唯一的遗憾就是第二个儿子因小时发烧没照顾好落下了后遗症，有点智力低下，但值得庆幸的是，他生活自理不成问题，只是不能工作挣钱养活自己。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一转眼我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了，那些青春年少时的花容月貌，回忆时都不能再想起了，面对镜子里这张布满皱纹的脸，除了记忆剩下的就只有叹息了。

年轻时的点滴回忆

梁奶奶口述 刘细霞整理

这位老奶奶姓梁，村里人都叫她好仔，她也喜欢别人这么称呼她。奶奶今年80多岁了，虽然年事已高但看上去还是精神矍铄。满脸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沧桑，笑起来像一道道小山沟，尽数着已逝时光留下的印记。穿着一身五十年代的青布衣，洗得有些发白了。因风湿，腿脚时常会痛，最近不知为何脚又肿了起来，我问，奶奶就笑笑说没事，反正又不痛。我听了都觉得特揪心，多么坚强的老人啊。

我介绍完来意后，奶奶哽咽着说：以前我们很苦，苦的真是连想也不敢想啊，很多的事都不要提，提起都会让人伤心落泪，平常的事可以跟你们聊聊。下面我们来听听老奶奶的“话家常”吧。

我娘家是住在新窖的，我25岁时嫁到新松这边。在家做女儿时，大哥对我很是爱护。那时大哥很聪明，能挣到些钱，所以家里还过得去。我连家务都不用做，有时间就是去村里学跳舞，那时村里有专门教扭秧歌的，我就常去那里跟着学。到大一点后，哥哥挣不到钱了，家境慢慢穷困了，哥哥就开始教我做各种事，说，怕我出嫁后被婆家人小看。还记得我第一次学挖泥，哥哥拿着铁锹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握锹把，怎么使劲没那么累。可我试了几

模范在每个时期都是被人推崇的，但不是每个模范都会出名被人记住，在某些特殊的年代，总会有那么一群不被人知的模范人物，被遗忘在角落里。他们并不怕被人遗忘，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精彩。这次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奶奶也算是其中的一位。

次，终于好不容易把泥挖起来，但手却很痛。哥哥说我的姿势和手法不正确，以后常做就会掌握了。然后把我一个人丢在那慢慢地挖，说挖完了那堆泥才能回家。我是一直哭着挖到天黑的。从那时起，我的苦日子算是开头了。每天哥哥都会带着我出去做事，像什么挖海泥、种蔗砍蔗、插秧、割禾等一样一样地学着做，差不多一年后，我再也不是什么都不会做的小女孩了，成了一个非常熟练的劳动能手。不论做什么都不会比村里同龄女孩子差，相反几乎是样样都独占鳌头，因此，我在我们村里还是小有名气的。

在我25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和我老公结婚了。结婚前我都没有见过他的面。结婚的那天，我坐着婚艇来到新松，在下艇时才见到我老公。第一眼看到他，个头细细，好像个细路仔（广东话指小孩子）似的，跟我心中想像的样子相差太远了，心里难免有些失落。结婚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原来我老公真的小我好几岁呢。那个年代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不管你嫁的人如何都要相守一辈子的。所以尽管人有些不如我意，但到了新松后，我一直都勤勤恳恳持家，孝敬老人、相夫教子，很尽职地做着为人媳妇为人老婆为人母的事，大家对我也一直都很好。虽然日子过得很艰辛，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那时我们吃的是食堂（意指食堂大锅饭），做工是在生产队。在生产队，我每年出的工都是最多的，所以挣的工分也最高。那时生产队是分等级的：一级10分，做的是去海里挖泥、打砖等重活；二级8分，一般是做田里的活和蔗地的活；三级5分，做的是割草等轻松些的活。而我每次都会争着去做一级的活，虽然很累很辛苦，但这样工分可以挣得多些。那时生产队里的人都老笑我：好仔啊好仔，你这样拼搏做什么啊？你一个女人家偏偏跑去跟男人比，你也不怕累哦。其实哪有不累啊，只是没办法啊，几个小孩要养，不去挣多些工分哪有吃的啊。

最初我家没有艇仔，去挖海泥就要借人家的艇，次数多了就不好意思了。为了可以多挣些工分，我决定去买只艇仔回来，可那时我也没什么钱，怎么买啊？想来想去，我狠心卖了两只猪，攒够了钱，叫我老公去买了只新艇回来，又叫他买了半斤厨粮（相当于现在的涂料的东西），把那只艇四周连里带面全刷得黑黑的，使艇看起来像很旧的一样，这样就可以防止被人偷了。有了艇后，我真的是很开心，每天早早出去做工，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一天到晚不停地挖海泥。挖完后不管有多晚，都要顺道割点草回来。只要割够百十斤草，就又有五个工分了。我就是这样不知疲惫地辛勤劳作，每到月底，我的工分总是最多的。

有一年，大队为了鼓励大家多挣工分，给挣工分第一的人奖励一件棉袄。我们那个队的队长来我家通知我，说，我的工分在整个大队是最多的，让我去大队领奖。当时我非常高兴，做完事就跑去大队拿，谁知一去到大队，大队的人说你是梁某某吗？刚才有一个人说自己就叫梁某某，已经拿走了棉袄，你看都签名了。我一看当时就傻眼了，我没有领，那到底是谁领走了呢？后来大队帮我查出来，原来另外有个生产队里，也有个叫梁某某的人，以为是奖给她的，早我一步领走了。后来大队的人说帮我去要回来，我想想都不容易，既然人家拿走了就给人家算了，何必又去要回来呢，我拒绝了大队的好意。

到了砍蔗的季节，由于劳动力少，我们经常要加班加点砍，有时砍到12点才回家。记得那一年，我的大儿子还很小，我背着他去砍蔗，由于平时表现好，队长就让我带着两个奶婆一起去蔗地砍蔗，并吩咐我要照顾好那两个奶婆的安全。我们在蔗地里拼命地砍，到晚上12点多才回家。为了走近路快点回家，我们要经过一条河，当时河水没多深，大概到膝盖这么深吧。于是我手拉着个萝筐，背着大儿子，深一脚浅一脚往对岸

走，时不时还要照顾下那两个奶婆，回到家里累得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现回想起来真的是太累太辛苦了，那个年代那种日子真的没有办法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所有的田地由大队分到生产队再分到个人，一个人大概可以分到几分禾田和几分蔗地。我们家共有9个人，分了一亩多蔗地和一亩左右的禾田。为了增加收入，我都会在蔗地里种些花生、白豆、毛豆之类的经济作物。田地分到各家后没那么累了，做事不再为了工分，也就没那么拼命了，相反日子却慢慢好了。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地都被政府征收了，我们也不用种地了。可是农民没了地，也是很难受的，像我们这代人种惯了地，一下子没有地可以种了，还真怀念当初种地的日子啊。

这就是梁奶奶的自述，虽然她并没有把内心深处那些触动人心的东西告诉我们，是她不想忆起那些曾经的悲怆的往事，更不想用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去换取别人的一丝怜悯。看得出，就算是到了风烛残年，她还是能保持着年轻时的那份傲气，我由衷的敬佩梁奶奶的作风，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一个榜样。

那些年那些事

李润弟口述 刘细霞整理

人生在世总少不了磕磕碰碰，总会有一些或多或少，或悲或喜的经历。

这次我们采访的对象李阿姨，她在人生的路上经历了从有声世界到无声世界的转变。尽管如此，她没有沉沦在自己的无声世界里，而是勇于接受命运的不公，乐观地生活。

她是一个平凡的顺德本地农村妇女，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顺德女人的坚强和勤劳。她的耳朵已失聪多年，与人沟通有些困难，可她却知道很多东西，连时事政治都能道出个一二三来。初见面时，感觉她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可能和她的开朗乐观有关吧。因听力障碍，她平时除了种菜、做事外，很少出门。和我们一聊，真是思往事而乐不停啊。下面就是她的故事：

我叫李润弟，今年68岁，有三个子女。在我生完儿子后得了一场大病，因当时家庭经济困难，就没有好好治疗。幸运的是，在足足病了二年后，性命总算保住了，听力却变得很微弱，正常的声音听不到了，必须贴在我耳朵边大吼才能听到一点。这事给我的打击很大，好长一段时间都在痛苦中煎熬。后来习惯了听不到声音，静悄悄的，却让我的内心更宁静安稳，没有丝毫杂念，所以我一直都在信佛。

要讲以前的事真的是太多，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经历过很多苦难的日子，一路走来，真是不堪回首，一个苦字都不足以表达啊。

我小的时候早早就没了父亲，所以只读了二年书就在家帮忙做事带大侄子。记得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闹饥荒，大

家都没有东西吃，刚开始就靠着藏起来的一点米，每天熬一大锅粥，全家人分着喝，每次我都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的，可是喝完肚子还是饿的“咕咕”作响。藏的一点米很快就吃完了，于是每天就喝点盐水充饥。再后来，盐也没了，饿了几天后，都觉得活不去了，都绝望了。后来就开始吃野菜、吃蕉头等，只要能活命，能吃不能吃的都把它塞进肚子里去。

这样撑了一段时间刚缓过一些，苏联又逼我们还债，这给本来就缺粮的我们，带来了又一致命打击。大家都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毫不藏私地全部上交了，养的鸡、鸭、鹅也都上交了。那些年我们都听说，苏联还做了很多模子用来量苹果，还回去的苹果每个都要放在模子里量一下，小一点都不要。那时我们的农业本就不发达，这样做无疑是为难我们。可我们中国人是很有骨气的，不管苏联如何的为难，我们勒紧裤带，挨饿吃苦硬是把欠苏联的债全部还上了，那段历史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再到后来就是吃集体饭，虽是有饭吃了但也吃不饱。记得那时有句流行的歌谣“农民头无食油，农民脚无着鞋”，清楚地反映了当时我们的生活状态。那时，物资紧缺，买东西限购，每个人购买的物资都是有限的，都是要用票的，粮票、肉票、鱼票、豆腐票、肥皂票、布票、煤票等很多种票，谁想多买一点都没有，是按人头进货的，所以日子过得很艰苦。

以前的顺德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到处都有河涌，出门做事也都是用艇仔。以前的地也非常不平，到处都是些小山包和荒地，后来为了方便种地就搞大基建，修平了所有的地和山包。然后把所有的地分到生产队，我们那时做得最多的工作是担泥、入填泥、敷蔗泥、砍蔗、插秧、割禾、找草喂鱼等。那时种地是没有化肥的，大多是拿河泥来当肥料。每天撑只艇仔去河里挖河泥上来，再一担担，担去蔗地里敷在蔗根上。一担河

泥少说也有100来斤重吧，每天这样往返都要挑上几十担，晚上回到家，全身都像散了架似的，两个肩膀更是火辣辣的痛。

再后来到了集体工的时候，也很累，但由于人多，做事时就会热闹很多，有时大家会争强好胜比试比试，斗个输赢。每天一出工，田地里都会沸腾起来的，一个生产队几十号人，边忙着做事边唱着咸水歌，歌声在田野间此起彼伏。伴随着欢歌笑语，大家都忘记了疲劳辛苦，开心愉快地在田间忙活。有时不同生产队的人还会在田间对唱，谁接不上就输了，输的一方就要帮赢的一方做一定量的农活，而赢的一方就可以坐在田埂上休息一会儿。所以那时虽然过得很苦、很累，但精神上还是很富有的，每天出工都会觉得很开心。

而让我最难忘的是去砍蔗，那时糖厂蔗不够用，就向生产队调蔗。生产队就让我们两个女人和另外三个男人去帮忙砍甘蔗，我们五个人一天要砍一万二千斤蔗交上去。为了完成任务，我们真是一个个累得够呛。早上天刚放亮就跑去蔗地里砍，中午就各自带了点饼和红薯之类的干粮，坐在地头上吃，吃完也顾不上休息一下，就又挥着刀砍起来，一直砍到半夜才回家。收蔗时天气虽然没那么热了，可地里被高高的甘蔗挡住了风，站在下面很闷热，加上又不停地在砍啊砍，浑身上下都冒汗，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时忙得连汗都顾不得擦，一个个都拼命地砍，都想快点砍完，好早一点回家休息。砍甘蔗可不同做其它的活，不但是个力气活还很容易受伤。甘蔗叶是很犀利的，一不小心扫在脸上，或刮到手上就会是一道血口子。所以我们女人都会拿块毛巾盖在斗笠上，既可以防止脸被蔗叶刮伤又能防晒。这样几天下来，手上都会磨出厚厚的一层茧子。

那时做事就这样，劳动力少，插秧、割禾都经常要赶工分。一赶工分就不分昼夜，真的是很累很辛苦的。工分是社员

的命根子，凝聚着大家的汗水甚至泪水。大集体时，一家少则三四口，多则七八口甚至十来口人，靠的就是在生产队挣的这点工分养家糊口。孩子上学、穿衣购物、油盐酱醋等一应开支均包含其中。绝大部分的家庭由于人口多，靠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根本不能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所以为了工分，我们饿着肚皮干活是常事。

除了做工，那些年做得最多的就是游行了。从解放初的斗地主分土地，到文革再到打倒四人帮等等，一有什么都会上街游行。游行是每个生产队社员都必须参加的，从步行街到顺德园都有游行队伍，一个生产队去一个地方。1962年至1963年期间，游行时会唱许多革命歌曲，但歌曲名字很多都忘记了，只记得有首歌叫《不忘阶级苦》。那时没有人教唱，我们都是听那些学生游行时唱，就跟着一起唱，慢慢自己也会了。

游行的当天，大家就都不用干活了，拿着队里自做的大字报，就是上面写有各种标语的白纸或白布条，浩浩荡荡走上街头，一起到各条街道上去，边喊口号边做着手势，就是举手一上一下的动作。记得我们喊的最多的口号是“中国人民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大家都扯着嗓门喊，几条街走下来，嗓子都哑了。走完各队分的街道，我们就可以各自回家了。我喜欢游行是因为我喜欢唱歌，平时也没什么机会唱，没人教也不会唱，游行时很多人都在唱，我就可以跟着唱，不论唱什么歌曲我都喜欢。

在那个时候虽然大家日子过的很苦，但大家的精神境界都比现在高。凡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准，那时候当官的要是贪污一千元，就直接拉去枪毙了，所以也没有人敢贪污。

我年轻时也有过为人民服务的经历，有一天晚上我在艇仔上休息，大半夜的时候，有个从北窖西海过来的女人，撑着船

带着个病得不轻的小孩要去人民医院(以前有条河通过医院的，那时刚好河干了，没什么水，船就进不了)，但她不认得去的路，在那里急得不得了。我看见了忙起身穿好衣服，带她走路去了人民医院。毫不相识的一个陌生人我都能这样去帮助她，全是受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导。还有那时候的火种是很珍贵的，每家就那么一两个。有次我家的用没了，生火都生不起来了，隔壁邻居见了，丝毫不吝啬地把火种给了我，邻里间的互帮互助精神，当时是件很平常的事。

我算是看着祖国一步步发展，并亲身经历着这一步步改变的人，所以我们的命运也是连接着祖国的命运。在国家困难时期我们是过着艰苦的生活，现在国家富强了，我们的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告别了过去的贫穷，过上了小康生活，这一切不是要感谢党吗？我很庆幸自己能有命享受这份福，现在我虽然浑身都有病，整天都要吃药，但对生活我还是充满希望的，我想活得更久些，可以见证祖国更好地发展。

尾 声

这就是一个听力有障碍的老年人的回忆，真的很平凡，却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她的一生不需要我们去渲染什么，只要你用心去听了、去感受了，就会发现这份平凡中的不平凡之处。最后我们一起祝愿李阿姨能心想事成，健康快乐！

光阴荏苒，转瞬即逝，岁月在悄悄地、无情地流失。一晃我已经在人生的道路上，度过了几十个春秋。这期间总有一些记忆，点缀着我最美妙的梦，推开记忆之窗，总能看到美丽而熟悉的风景。

难忘北京行

刘焕玉口述 刘细霞整理

我叫刘焕玉，老家在四会市的一个贫困山村，因家中贫寒，从小没上几年学，早早就在家帮忙干活，看着人家的孩子读高中上大学真是打心眼里羡慕。

1983年，那时我18岁，经家乡人介绍来到顺德一家沙发厂打工。那时沙发很流行，但凡有点钱的人家都会买，所以沙发厂的生意很兴旺。为了多挣点钱，每天我都和工友们积极地做着繁重的工作。刚进厂不久，老板就接了一张大单，记得是北京设计二院订了2000多套沙发。由于量大，而且为了保证质量，老板决定要去现场装成品。就是先发半成品，通过火车把所有加工好的材料运过去，然后再安排十几个工人去北京现场把沙发装起来。听到这个消息时，全厂的工人都沸腾了，个个都争着抢着想去，都想借工作机会，游一游祖国的美好河山首都北京。

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能到顺德这个经济发达的小城镇打工，就算很不错了，觉得非常满足，现在竟然能去祖国的首都北京，那是何等的振奋何等的荣耀啊！所以当老板宣布去北京人员名单时，我的心都跳到嗓门了，连大气也不

敢喘，心里默默地念叨着：我啦，我啦！当清清楚楚地、真真切切地听到刘焕玉这三个字时，我高兴的差点叫出声来，简直就想跳起来。家里人和朋友们知道我要去北京也都羡慕的不得了，个个都夸我工作干的好有本事。

几天之后，我就和工厂十来个工友一起，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广州坐火车去祖国的心脏——北京了。我们整整坐了两天一夜，火车上人很多，车厢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所以想站起来活动一下都很难，长时间坐车，大家的小腿和脚都肿了。由于是第一次坐火车，又是去北京，当时的心情真的是好兴奋。年少的我和工友们，一路上都在想着美好的首都北京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一点也没觉得累。

到北京后，我们吃住都在客户的公司，刚开始，饮食方面我们都不习惯，因为北京属北方，饭堂面条花卷馒头等面食比较多一些，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南方人吃不惯面食时，就主动为我们多做一些米饭，这样我们吃饭就有了选择。

为了赶时间争进度，早日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加班加点起早贪黑地组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几千只沙发全部组装好，交给客户验收，所有的沙发质量全部合格。

由于大家的不懈努力提前完成了任务，老板很高兴就带我们在北京游玩了几天。俗话说得好“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第一站游玩的就是万里长城，据说这万里长城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了巩固国家的安全，防御北方强大匈奴的侵扰而修建的。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来到长城，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说。

长城从远处看就像一条长龙，在崇山峻岭之间曲曲折折、蜿蜒起伏。当我怀着好奇的心情，亲自体验登长城时，又感觉非常难登，有时登上去一步会退回两三步。当我终于登上长城时，感觉有一股很大的风从后面的山上吹来，好像整个

人都要被风吹走似的。当脚跟站稳之时，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长城的墙壁，用脚慢慢地体会着长城坚实的台阶，用眼仔细地欣赏着长城的美景，心里感到无比的自豪。

终于登上了第一个烽火台，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到了望口和箭窗那儿看后山的风景，我看到后面的山一座连着一座，崇山峻岭、连绵起伏。当时心想，即使这些高山和万里长城，也未能阻挡匈奴进犯中原的铁骑。长城建筑之宏伟，建筑之坚固，建筑之出奇，真不愧是人类建筑文化史上的瑰宝。在长城角下我还骑上真骆驼拍下了几张照片呢。

接着几天，我们去了故宫、颐和园、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期间我还站在真真实实的战斗机上拍了不少照片。

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纪念堂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听说毛主席纪念堂开放以来，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前来参观。那天我也随着人群排到队伍里，前后观望时，我感觉这支队伍好似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龙。远远望去纪念堂的周围种着许多高大挺拔的松树。我们等候了将近1个小时，才进了纪念堂的北大门。登上台阶就来到了宏伟壮丽的北大厅，进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毛主席雕像，只见毛主席坐在椅子上，面带慈祥的笑容。雕像后面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雕像两旁伫立着十面五星红旗，雕像前面摆满了各种鲜花。

随着人流的慢慢移动，我们向北大厅移动，来到了瞻仰厅。当时我心里害怕极了，有生以来头一次经受这种场面，吓得我整个身子都在打颤，腿都软下来了。好在人多给我壮了胆子，使我增加了勇气，我的脚步才没有停止。我的眼睛也紧紧地盯着水晶棺，只见毛主席安详地躺在水晶棺材里，看上去就好像在睡觉一样，和小时候我见到的毛主席像没有什么两样，心情平稳了好多。看着毛主席的面庞，我默默地

流下了眼泪。主席的身上盖着党旗，棺材的底座上镶嵌着国徽，水晶棺的四周摆满了一盆盆的鲜花。四个表情严肃的士兵守护着毛主席。墙壁上镶嵌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当时我在想：毛主席为了解放中国，牺牲了家里的好多亲人，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人民为穷苦大众打下了一片大好江山。毛主席虽然去世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当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大门时，我想到我居然亲眼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看到了伟人的形象，而且还是那么近的距离，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那天的经历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毛主席的容颜时常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毛主席是我们穷苦农民的恩人，让我们过起了好日子，我们永远怀念他。

北京之行虽然拍了很多的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居无定所而没有保存下来，这多少让我感到些许遗憾。不过最珍贵最难忘的都让我保存在记忆里了，无论岁月怎么流逝，都不会把它们带走。我这一生能有这样的经历，真要感谢改革开放，它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让我在人生的路上“英雄”了一回，让我在回忆往事时不再空泛无味。



现在的我，喜欢做义工，日子过得开心快乐

平凡母亲 伟大的爱

梁妈妈口述 刘细霞整理

母爱像一首小诗，优美恬净、清和淡雅；母爱像一幅山水画，虚静幽远、清新自然；母爱像一缕和煦的春风，吹去冰雪酷寒的严冬，带来美丽妩媚的春天。母爱是伟大的、是无私的、是圣洁的、是不求回报的。她沉浸于万物之中，充盈于天地之间，让那些彷徨无依的心灵找到了栖息的家。

父母抚养儿女原本是很平常的事，但如果让你三十年如一日，去抚养一个除了嘴能吃东西外，什么都做不了的残疾女儿，你还能轻松地说是很平常吗？下面我采访的就是这么一个平凡却又伟大的母亲。

她原是清远人，年轻时经人介绍远嫁他乡，来到顺德。刚结婚那阵，家里什么都没有，一贫如洗，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吃饱饭，她和她老公两个人不怕苦不怕累，整天努力做事就为多挣些工分，常常收工后还要到处去捡柴火，这样既可换些零钱贴补家用，也可以自己烧。就这样勤勤恳恳地过日子，勉强还算过得下去。

她原是清远人，年轻时经人介绍远嫁他乡，来到顺德。刚结婚那阵，家里什么都没有，一贫如洗，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吃饱饭，她和她老公两个人不怕苦不怕累，整天努力做事就为多挣些工分，常常收工后还要到处去捡柴火，这样既可换些零钱贴补家用，也可以自己烧。就这样勤勤恳恳地过日子，勉强还算过得下去。

1981年她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这给初为人母的她增添了无尚的喜悦，可是这份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忙于生计对女儿照顾的不周，导致小孩生病夭折了。这个打击对她来说真的是很大，可以说是痛彻心扉，至今也令她难已释怀，讲起来依然泪流满面。

所幸老天眷顾，1983年她又生了一个儿子，小生命的降临给她及贫困的家庭，又带来了希望和增添了不少欢乐，同时也让她们更犯愁，毕竟多一张嘴，生活压力就更大了。从此她和老公就更

加卖力地出去做事，只要能挣到钱，什么苦活累活都会争着去做。

正当她们全身心地为改善生活而努力时，小淑女又要降临了。当时为了省钱，她连医院都没有去，在家花30元钱找了个接生婆，淑女出生时脐带绕脖，当时也很危险，好在又缓过来了。由于当时的生活条件太差，导致没有奶水喂养，所以小淑女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两三个月大时就一直气喘。去人民医院看时说是气管炎，拿些药回来吃，但一直未见好转。当时的家庭条件非常拮据，哪有什么钱再去医治。治疗不及时孩子就一直发烧，烧得虽然不是很高，可就是不退，而且也坐不起来，一直都是昏昏沉沉地睡着。看到孩子这个样子，她心情特别沉重，天天吃不下睡不着，想尽一切办法酬钱，后来又去了几个医院医治可仍不见好转，后来又去了省城广州的一家大医院，好不容易烧是退了，大脑却坏了。那里的医生说要想医好是不可能了。万般无奈之下，她把小淑女带回家，心里真希望能有奇迹出现，等孩子大些时会自己慢慢地好起来。

小淑女的病痛，给这个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了绝望。怎么办？是被困难吓倒还是迎着困难上呢？这时她只能选择坚强，任凭



采编在给梁妈妈读为她写的回忆录，梁妈妈一面听一面给女儿喂饭

泪水默默地往肚子里吞。为了两个孩子，为了家庭，为了生计她没有倒下，孩子们还指望着她呢。

九十年代初，她和老公商量决定挖鱼塘养鱼。没有资金投入，就到处找人借，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就这样开发了几十亩的鱼塘。早上三、四点钟她就起床去割草、抬猪粪，做完活马上就得赶回家照顾两个孩子，还要帮小淑女擦擦洗洗，然后再煮早餐，喂完淑女还要赶去菜地种菜。天天都是这样没日没夜地两头跑，有时她真恨自己怎么不多长两双手啊，那样就能都顾得上了。这个鱼塘养了没多久，债都还没还清，就赶上了闹鱼灾，整塘的鱼死了一大半，真是屋漏偏逢连雨天啊。看着自己这么辛苦的付出就要变成一场空了，她真的是欲哭无泪。虽然赶上了鱼灾，但坚强的她并没有被厄运所吓倒，咬咬牙继续养下去。

每天照样还是起早贪黑的日子，守着鱼塘一过就是十一年啊。十一年里，她们住的就是鱼塘边自己盖的铁皮屋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活用品，一盏几瓦的电灯吊在屋顶，摇摇晃晃。夏天，铁皮屋里热得透不过气，到了晚上蚊子又多又狠，淑女躺在床上动也动不了，她只好每晚守在旁边帮淑女扇风赶蚊子，用她的这种母爱润泽着女儿小小的心灵，女儿的一饮一啄，她都为之激动。她那双粗糙而弯曲的手，在黑夜中挑灯缝缝补补、永不停歇，把那无私的母爱缝在针线上，穿在女儿的身上。每晚等到儿子写完作业了，也会很懂事地过来帮忙给妹妹扇风，这样她又要抽身去做其它事情。如遇上个刮风下雨天就更难过了，屋子到处漏水，接都接不过来。后来拆迁，一家人搬去一个十几平米的平房居住。一样的又热又闷，连晒衣服的地方都没有。好在不用担心漏水，且总算有个像样的住处了。

当初有人看到她的家境，建议她去居委会申请援助，看着

慢慢长大的淑女，想着负债累累的家庭，她硬着头皮去找居委会的干部，可能当初比她困难的家庭还有很多，最终她的申请没有批下来，虽然她心里很失望，但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苦命的淑女，她硬是苦苦地支撑下去，还是一如既往地起早贪黑去做事情。尽管日子过的很艰辛，可是她对女儿的照顾却从没敢懈怠，白天尽量留在家看管女儿的起居。女儿上厕所也得要抱着去，有时没发现或来不及抱去厕所就要换裤子，这样每天都会折腾好几次，还要每天帮女儿到处按按，尤其是背部每天都要按摩数次，这样能防止肌肉萎缩。

因为女儿神经衰弱，吃东西慢，喂一次饭都要很长时间。女儿还有哮喘的毛病，经常喘的很厉害，她就常煲川贝给女儿喝。还要时刻注意女儿的保暖，一受凉就会咳嗽。天气好时她会背着女儿去外面转转透透气。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身体越来越重，她每天抱着女儿上厕所都很吃力，她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抓住，因为常长时间维持这个动作，她的手指都僵硬伸不直了，加上年纪大了，很多的病都累出来了。她感到体力不如从前了，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她从当年的年轻力壮，磨到了现在的满头白发、浑身病痛、慢慢变老的身形，也有些背不动女儿了，人老了心里的担忧也就越来越重了。

2012年居委会领导换届后，她又一次试着去申请援助，没想到很快就办下来了。妇联主任还经常去她家慰问，有什么要求让她尽管提。她现在真的很开心很感动，第一次向居委会诉说了这些年的不易，也表示出真希望能有个轮椅给女儿坐，这样她就不用再每天背着那么大的女儿出去了。没多久就有一个热心人士给她捐献了一把轮椅，她终于可以轻松推着女儿出去散步了。她的女儿坐在上面也很舒服、很开心。后来友邻社工站的社工和义工也定期过来探访她们，这无疑又让她的女儿很开心，觉得瘫痪的自己终于有了朋友。政府的援助和这些慈

善机构的关心，让她从心里感到了人间的真情，社会的温暖。

现在儿子大了，有了工作，很快也要自己另建家庭了。儿子也很孝顺，对妹妹也很疼爱，看得出来这让她很欣慰。但她最大的担忧还是怕自己老了时，照顾不了女儿，诚心希望政府能帮助给女儿一个好的安置，以了却她的牵挂。

她是一位平凡的母亲，虽身材瘦小，却有着海一样宽阔的胸怀、山一样的顽强毅力。历经岁月的磨砺，让残疾女儿的人生像苍穹一样广阔无限。她的身上始终有一股自强不息的精神，即使生活中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扛得过去，在她的一生中没有逾越不了的鸿沟。同为人母的我，内心除了自愧不如，就全是对梁妈妈的无比敬意，这是人世中最美的母亲。

以上是本次采访中主人公梁妈妈的亲身经历，梁妈妈的故事在她那个年代，可能并不是最凄惨的，但绝对是最真实最感人的。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三十年如一日，在这样贫穷的家境下照顾着这么一个卧床不起，除了吃连动都动不了的女儿，她的这种母爱，我想用任何词汇都无法去形容的。采访即将结束时，我问她今后怎么办？她从容自如地说：“既然命运这样安排了我，我将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下去，继续照顾好淑女直到最后。”多么亲切的声音，多么慈祥的母亲啊！



儿子就读的新松小学，如今已经合并扩展成桂畔小学了



儿子就读的新松幼儿园，如今已拆掉了



女儿十五岁时，梁妈妈说她像个“小番薯”



好心人为女儿捐赠的轮椅，让梁妈妈轻松了不少

新
順
德
居
民
愛

往事钩沉

时光荏苒

遥望当年

谁都有一段

难以抹灭

的记忆

武阿姨的往事

武丽霞口述 陈小玲整理

武阿姨出生于1955年陕西西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里。普通平凡的她，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按她的一句原话“生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最苦最累的，什么都经历过，什么苦都吃尽了。”她的童年过得比别人都要苦要累，没吃没穿还没得玩，小小年纪就要帮妈妈干那些沉重的农活。当她回忆过去时，说话的声音都变了，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

武阿姨7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在那个时候原本就贫困的家庭还失去了顶梁柱，那日子过得真的是苦不堪言。当时武阿姨的母亲也才35岁，村里人看他们家实在是太困难了，就建议她的母亲招个人来入赘，过来照顾自己和五个儿女。她的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没有听村里人的建议，生怕成家后还要生小孩，将来对自己带过去的子女不好。勤劳辛苦的母亲，无私地将自己一生精力放在了这个家庭中，她毫无怨言地不辞辛苦的供养着、培育着五个儿女。

7岁正好是上学的年龄，别人家的孩子都去上学了，只有武阿姨交不起学费不能去上学（当时一学期学费是1元钱），

只能在家里帮着妈妈做家务和照顾弟弟们。按她家当时的情况确实也无法上学，吃都吃不饱更别想上学了。她的母亲经常是不吃省下来给孩子们吃，虽然这样孩子们仍是吃不饱。妈妈白天在生产队干农活，为了生活为了能养活五个儿女，晚上还要工作到半夜，纺线织布换粮食吃。武阿姨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纺线织布帮助母亲维持生计。都快10岁了还是没能上学，但是她对上学的渴望还是那么的强烈，后来得到了母亲的同意，武阿姨终于如愿以偿上了学。这可把她乐坏了，能上学真是不容易，所以武阿姨比谁都努力学习。小小年纪的她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为家里争口气。从小武阿姨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后能玩能和自己的父母撒撒娇，自己放学后却要帮妈妈做家务。

小学时期的她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武阿姨去上学直接就上了三年级。没有一、二年级的基础，学起来真的很困难，拼音字母都不认识，写字也不会，一笔一画对上，看着像那个字就是了，她从来不知道按笔画写。但她有种不认输的刚强的性格，这机会对她来说来之不易，所以再苦再难也不会放弃的。经过她的不懈努力，成绩终于上去了，算得上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

那时上学是提倡勤工俭学，上学有两个任务，一是劳动，二是学习。劳动主要就是打小石头用来填铁路路基用，有时还会去山上开荒。这真的是很辛苦的活，这么小的孩子天天坐在河边打石头，用两脚夹着石头就用小铁锤打，一个不小心就把自己的小脚给打伤了，手上也是起满了泡。三伏天的时候石头都被晒得滚烫滚烫的，地面上的热气蒸上来，热得连大人都受不了，更别说小孩子了。中午还不能回去休息，所以每个人都要带上午饭，走十几里的山路来到这河边劳动。条件好的都带上好点的午餐补充体力，武阿姨就没办法

了，因为家里条件差每天只能带几个玉米馍，这玉米馍既不好吃也没有营养，只能是填饱肚子的食物。工作的时候馍就放在地上，蚂蚁都钻进去了，那也没办法，肚子饿了只能吃了。中央如果下来个什么指示，学校又得停几天课，这是常有的事。有时还会停几个月去生产队干农活。一个学期只有一半时间是上课的，另一半时间是用来劳动的。她的小学就是这样半工半读完成的，等上初中时就没那么多的劳动了。

直到1972年武阿姨高中毕业了，那时上大学是白卷推荐，一般是村长、书记、生产队长这些人的孩子才有机会上大学，像武阿姨就只能回生产队了。上不了大学，她非常不甘心，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当时就是这种情况。她说要是能参加高考该多好啊。武阿姨回到生产队后很认真地工作，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什么都做，只想着有个好表现。

她这一生中有一件最难忘的事，也是影响了她一生的事。由于这事件，她失去了太多的工作机会和美好的前程。事情起因是这样的：他哥哥和村里的一个女孩情投意合，结果两个相爱的人，却因各种原因无法在一起，最后两人选择了不能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来结束这段恋情。他们双双自杀，结果女的死了，武阿姨的哥哥却被家里人及时发现救起了。这之后，女方的家人就一直找他们家的麻烦，还把她的哥哥告了，说是她的哥哥把他们家的女儿给逼死的。报警后，她哥哥被抓去拘留所了，还要武阿姨家赔偿300元。当时劳动一天的收入才值五毛钱，300元那得要做多久才能还得上啊。武阿姨家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样太不公平了。武阿姨就想到帮哥哥平反。马上就找人写了一张状纸，借了别人一辆自行车，连夜往县城法院赶。她当时根本不认识路，大半夜的一个女孩子打着手电筒骑着自行车，一路上也没有人，只听见蛙鸣和风刮树叶的沙沙声。那时也不知道害怕。直到中午才找到中级人民法院，不过已经下班了。武阿姨只好在那苦

等，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上班才把状纸交了，并向法院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当时武阿姨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这事情能不能办好，哥哥能不能放出来，无奈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踩着自行车往回走。

由于武阿姨是从乡下赶来的，不太懂交通规则，又加上心慌意乱，在经过一座桥时，突然被迎面而来的两辆车夹在了中间，如果自行车头稍稍偏那么一点点，武阿姨就没命了。这可把武阿姨给吓坏了，心里咚咚咚跳了半天，想想都后怕，为了哥哥这事差点把命给送了。

最后法院传来了消息，哥哥的事情终于得以平反，很快就被释放了。虽然哥哥得以平反，可哥哥的行为却让这个家笼罩了厚厚的阴影，麻烦事从此接连不断。原本武阿姨是个勤奋好学努力做事的孩子，这些村干部是看在眼里的，大家也都觉得她是一个干部的好苗子，连学校校长也是看好她的，想让她去学校当民办教师，结果都因哥哥的事给卡下来了。



如今的主人翁和小儿子生活在一起，生活很幸福很满足。

武阿姨说，她这一生都被哥哥这事给耽误了，心里真的很不甘心，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后来只能在村里当个出纳。三年后，她嫁到了邻村，婆婆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由于是邻村，村里也知道武阿姨以前做过出纳，得到村干部的认可，所以武阿姨一边在家务农，一边继续在村里做出纳。

没多久，武阿姨的大儿子出生了，生了孩子，家里给她做的一顿最好的饭菜就是醋炒韭菜、酸菜拌面条。两年之后她又有了小儿子。如今武阿姨已将近60岁，两个儿子也已长大成人，并且各自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现在每每见到武阿姨，她的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容，总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现在的生活和以前比那真的是天地之差啊，垃圾桶的油比以前一天吃的油都要得多。

武阿姨的老家是陕西的，刚来顺德小儿子家居住，还不太习惯南方的生活，尤其是无法和当地人沟通，但是她喜欢这里的生活环境和气候。老家比较缺水干燥，到处都是尘土，家里一时不扫就是一层的灰。这里的空气湿润住着舒服。对于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武阿姨来说，语言沟通这点小问题根本算不了什么。比起以前的苦日子，现在的生活简直就像在天堂一样。她感觉自己比以前年轻多了。

老曹的打工岁月

曹先生口述 张海芳整理

我叫曹志超，祖籍在湖南省沅江市琼湖镇跑马岭。我出生在书香门第，太爷爷是清朝宫里的御医，爷爷是中国第一代工程师。我们从小就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家族也出了不少“有出息”的人。

我从部队退伍后就被分配在老家的一个国营企业上班。那时每月300块钱的工资，只发70%，拿到手就是200多点，日子过得很艰难。九十年代起，大部分国企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等政策，所以造成了大量工人下岗，不幸的是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那时的广东经济发展的很快，内地很多下海捞金者纷纷下广东，而且先去的人好多都发财了，于是迫于当时的情形和生计我也选择了来广东打工。

我是1993年6月份来到顺德的，那时，我爱人的舅舅在顺德工作，所以我也来到这里。刚来的时候，广东这边的治安是很乱的，外来人口都必须办个暂住证。其实暂住证就是移民文化的一个标志性产物，它让初到这个地方的外来人口，拥有

一个人的勇气、智慧、胆量与自信将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和前途！

了暂时居住的权利和一个身份。不过这个词语本身蕴涵着生活的不安定性，纯粹只是方便了本地的行政部门对人口的一个管理。而当时在顺德办一个暂住证的费用是需要600多块钱的，普通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最高的也就600块左右，低的才400多块，所以面对这份相当于一个月收入的不正常支出，很多人都会选择逃避，实在是舍不得去办这个暂住证。于是就有了治安队的人经常在出租屋、小区里查暂住证，有的甚至还会在人们上班的路上设卡堵截。如果一旦被查到没有办暂住证，就会被抓去派出所。等到有人拿钱来赎就会被放出来，如一直没人来赎就会被遣送回原籍。这样算是好的，听说有些人被抓进去后不知是他倒霉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然会挨一顿毒打，更有甚者听说还有打死人的现象呢。

后来可能因为白天搜索的成效不大，治安队查暂住证经常会在晚上，夜深人静时来个突然袭击，所以大家晚上睡觉都会很担惊受怕的，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连衣服都不穿就找地方躲起来。记得有一次凌晨一两点钟时，我刚放松紧张的心情睡得正香呢，突然外面就鸡飞狗跳起来，只听见一阵阵的骚动和吵闹声。我悄悄地探头一看，只见对面楼里一些人，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跑着，有的从二楼直接就跳下去，有的还往楼上面的平台跑，个个抱头仓皇出逃，到处是惊恐乱窜、慌做一团的人。而楼道里则是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的治安人员，他们用我听不懂的白话大声吼叫着，手里拿着那种强光手电筒到处照着找人，那种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唉，什么日子啊！

本来办暂住证是地方的治安保护政策，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好事。却由于下面执行的人把本质弄偏了，好事竟成了坏事，搞得对治安不但起不到任何的保护作用，相反造就了不少的暴力执法人员，给人民群众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带来了无形的精神创伤，并导致了社会治安形势的紊乱。

那时找工作也挺难的，都是要经中介介绍的，介绍一份普工的工作介绍费就要100多块。我因为懂机械技术又有工作经验，所以很快中介就介绍我去一家单车厂做生产工。那时我就深知国企和私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国企机关工作人员大部份是“一杯茶水一颗烟，一张报纸看一天”。国企的工人则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坐着聊天、喝茶，工资照拿。私企，要想有份好收入就得天天埋头苦干、加班加到喘不过气来，那份辛苦真是无法言说。我进到那个厂后就格外珍惜那份工作，刚开始是很不习惯里面的工作制度。有些工种是计件的，那些工友从一上班就非常专注地做着自己的事，连上厕所都不舍得去，真是争分夺秒地做啊。我刚去看到这种情形还真有点不屑，可后来慢慢才了解到多劳多得啊，大家出门打工就是求财的，如果不那么拼命做，月底开工资就只有那么一丁点儿，真是望钱兴叹啊。想通了后我也努力工作，每天不怕累不叫苦，不但把自己份

内的事做好，还经常帮别人做这做那，从不计较得失。再加上我懂些机械方面的技术，车间机器有个什么故障，我也能把它弄好。短短四个月后被提升为车间主管，这在我们车间可以说是个奇迹，很少有人这么快就升职的。

当时机械化的生产车间让我的这个特长有了足够的发展空间。我们车间里机械有什么问题我几乎都能解决，老板有时遇到什么机器方面的难题，都会找我讨论解决方案。慢慢的时间久了，有些外厂的机器出现问题，也会来找我一起讨论解决。那年我虽然才29岁，可不管是老板还是工友们，都叫我老



我发明的中国
第一代塑胶烫衣板

曹，我也因此在厂里小有名气了。

后来我又去了一家做家具用品的企业，叫保利亚。这家公司在中国家具用品里是排在第二位的。当时我各方面的能力也更强了，于是我进去后做设计工作。这份全新的工作对我来说，充满了挑战和机遇，重新燃起了我的斗志和雄心，因为我平时就喜欢搞一些小创作和小发明，尤其喜欢设计些家庭生活中比较实用的小玩意。

记得在我刚进厂不久，就遇到了美国对中国的铁制品的反倾销。当时厂里生产得热火朝天的烫衣板，一下子就跌到了零点。老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严令我们技术部马上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来。我那些天就日思夜想，到底有什么办法呢？后来突然灵光一现，我们可以用塑料板来代替铁制板啊。一想到这点，我整个人都兴奋起来。马上找来材料连夜设计，把所有的铁制烫衣板支架改成塑胶做的，把原来的产品质量改良并精改外观。经过我一次次的改良，终于做出烫衣界的第一款塑胶烫衣板。当时样品一出，轰动业界。产品一投入市场就得到了大家很好的评价。尽管美国还是在对中国铁制品反倾销，可我们企业还是创造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我们烫衣板的出口率，占到美国市场的72%。我的这项改造不但挽救了公司的困局，并给公司带来了不菲的价值，所以这个产品让我非常有成就感，至今我还保留一个在家里呢。

工作让我学会了很多，如人际交往、应变能力、专业知识的提升等，所以我一直把工作当成一种快乐和学习途径。我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财富，从而去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工作之余，看看书、上上网、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聊聊天，不会去想太多，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去寻找生活中的美好和幸福，这样就足够了。

暮然回首，出来打工已有二十年时间了。二十年啊，包含了几多艰辛，几多收获。这些年来，我换过几份工作，虽然挣的钱并不多，但至少感到自己的心态一直还是积极向上的，对待经历过的每份工作都很努力和用心，所以每一次的离开都是我的一个新的开始。一路走来我并不后悔，对自己的选择都是坦然面对和勇敢地接受。

打工路上，职位有高低，出入有不同，且个人能力有强弱。但，不管自己处于哪种地位，都不要抬高自己鄙视别人，因为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起跑线不同而已。工作也是不分贵贱的，把事做好就是对自己的人格乃至能力的最好肯定。打工的路上我们也会认识到很多的人，有同事、老乡、客户或供应商等，有的因工作利益而相识，有的因兴趣爱好而认识，也有的因为身在异乡，因乡音乡情而结识。但不管怎样，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出来打工的，能够在茫茫人海中认识，便是一种缘分。在外漂泊，孤身一人，常常会感觉到孤独和无助，有了朋友的关心和问候，会让枯竭的心灵得到泉水般的滋润，打工路上就会充满阳光和雨露。



天灾无情人有情

张惠珍口述 张海芳 陈小玲整理

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在一次猝然降临的特大暴雨中，引发整整一个水库群的大规模溃决。在当时无论是垮坝水库的数目，还是蒙难者的人数，都在全国同类事件之上，这一天灾与人祸，不能不令我们这一代人铭心刻骨。

1975年8月4日，第3号台风穿越台湾岛后，在福建省晋江登陆，越过江西，穿过湖南，在常德附近突然转向，北渡长江，直入中原腹地。暴雨中心林庄3日最大降雨1600余毫米，板桥水库流域3日降雨量达957.5毫米，其强度之大历史罕见。据查阅北京故宫博物院档案和有关专家分析计算，达到了六百到千年一遇。这场特大暴雨中心在河南省洪汝河流域。暴雨来到时，白天如黑夜，雨若悬河一样从天上落下来，从屋内伸脸盆出去，眨眼间就满满一盆。暴雨如箭矢一样，雨后，树枝刷成了光杆，叶落遍地，鸟雀死亡无数。

位于暴雨中心洪汝河上游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8月5日下午开始，水库水位猛涨，相继超水库设计和校核水位，继而超过坝顶，漫溢过大坝防浪墙顶，导致这两座（始建于解放初期的大型水库）大坝于8月8日凌晨3时左右，在主河槽段溃决。确山县的竹沟水库，午阳县的田岗水库和洪汝

那个令人流泪的日子，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八年了，它震惊了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震动了每个人的心。安息吧，在那次大洪水中逝去的人们。你们可曾知道，我也是你们的老乡，我也在驻马店生活，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也在逃亡，只是我比你们幸运一点而已。不要伤心，不要难过，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记着你们，在为你们祈福！

河上游的部分小型水库大坝也先后溃决。上述大坝垮坝后，从水库冲出来的洪水，如脱缰的猛兽，直奔洪汝河两岸，水头高数丈，凶猛异常。滔滔的洪水所到之处，冲毁了河渠堤防和公路、铁路、桥梁、电力、通讯设施、房屋、农舍，合抱大树被连根拔起，洪峰经过之处，挖地三尺。数万名群众伤亡，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这场特大洪水灾害之大，不仅震撼全国，而且世界也为之震惊。

特大洪水到来之前的淮河上游地区，事实上已隐伏着严重危机。板桥、石漫滩等大型水库可能垮坝的潜在危险人们并无警觉，“垮坝”二字在人们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谁也没有见过“千年一遇”的洪水，而当真正的大洪水来了，突然而降的大水使人们瞠目结舌，束手无策。它的雨量，竟相当于人们所说“千年一遇”的两倍。

7日晚间，确山、泌阳等几座小型水库和中型水库垮坝。此时，板桥水库大坝上一片混乱，暴雨砸得人睁不开眼，相隔几步说话就无法听清。大批水库的职工和家属，正被转移到附近的高地。哭声、喊声、惊恐声在暴雨中形成一种惨烈的凄叫。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一寸寸地上涨，把人们一步步地逼向死亡的临界。

上涨的库水迅速平坝，爬上防浪墙，将防浪墙上的沙壳一块块掏空，水库职工还在作着无畏的抵抗，有人甚至搬来办公室里笨重的书柜，试图挡住防浪墙上日渐扩大的缺口。

突然，一道闪电，紧接着是一声炸耳的惊雷，万籁俱寂，暴雨骤然停止。这时，就听一声惊叫：“水落了”，只见大水突然间就“哗”地回落下去，速度之快，使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就在人们欢呼“水落了！水落了！”的时候，板桥水库管理局公安科长的脸色骤然间变白，刚才的那个霹雷，曾使他周身触电似的麻了一下。此刻，那座板桥水库突然间萎缩，6亿立方米的库水令人恐怖地滚滚下泄。

也就一天的时间，洪汝河上游的数十座水库相继垮坝。洪水向四面八方奔突，扫荡，又在四面八方合流扩展，在直立几丈高的惊涛骇浪中，田园、村落、集镇须臾间化为乌有。水库垮坝瞬间的突然释放，具有无法抗御的毁灭性力量。板桥水库垮坝后，距水库最近的沙河店首先被大水吞噬，因洪水势头凶猛，虽经全力抢救仍有很多人遇难。与沙河店仅一河之隔的遂平县文城公社，群众完全没有得到洪水警报，因此文城成为洪水中损失最大的地区，全公社3、6万人口中，有一半人遇难。

当大水淹到我们单位的房子的屋脊时，单位的人都爬到房子顶上大喊大叫。后来，附近驻扎的解放军赶过来把我们救了出来，安置在军营里，管我们吃住。在军营里休息，所以我得以逃生。

一位幸存者说：大水下来前，我们并不知道水库会有危险。天黑时，村里人看见河南岸沙河店那边，影影绰绰有人在比比划划大喊大叫，可风声雨声太大，根本听不清喊的啥。大水奔腾而下，人们四散奔逃。有一户人家来不及跑，眼看着排山倒海的大水压下来，家里人情急之下把五岁的小女儿放到了一棵长满刺的大枣树上。等到洪水下去，救援的人把她从树上抱下来，才看到，她身上扎满了刺，人都吓傻了，一句话都不会说，给她挑刺的时候，也不知道哭。

村民魏姓人士曾回忆当时的情况：全家6口人中有4人丧生。他说：天黑时，全队人都往地势较高的大队部躲。三个妮儿，俺家里的抱一个，我抱俩，手里还拉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子，刚进院子，眼看着大水就从高高的墙头扑进来，象盖被子似的把满院子人都闷在里面。

当时五十岁的吴女士回忆说：我和我十一岁的妮子被水闷住后，倒塌的墙就砸在我娘俩身上，险些被砸死，幸亏一个大浪把俺们托起，掀了出去，妮子眨眼间就不见了，我只觉着昏天黑地，抓住一捆秫秸就随水飘走了。

还有一个魏氏幸存者说：水来前，我正在找绳子，准备拉老父母上树上房子。父亲刚把绳子系到屋檐上，大水就进了屋，我当时就看见那么结实的绳子跟一根线似的一下子就断掉了，再看，老父母已经被水冲远了。

还有人回忆：我把老奶奶放进拖拉机的门楼子里，大水下来时，水头将奶奶和拖拉机一起卷走。

当时有一位74岁的小脚老太娘说，我们全家8口人，4人丧生。她说我是见过大灾的人，见到大雨下得这个样，我就在屋里蒸馍，蒸了一屉又一屉，眼见着雨愈来愈大，我把衣服都翻出来，穿上了两条裤子，三件上衣，连袄都穿上了。就听儿子喊，快走快走，快上大队院！俺娘俩还没有走到大队部，就听见轰隆隆一片房倒的声音，还不及挪步，人就漂在水里了。这老太太被卷到上百里外的阳丰大桥底下才被一棵树卡住，她挣扎着从树棵里爬出，临时穿上的几件衣服早就被洪水冲没，身上拉了许多口子，没剩下一块好肉。

还有个人说：我是抓着房上的一只藤箩往下冲，一路冲到遂平城下，也不知喝了多少水。人们都说，县城南门、车站大桥和铁路是三道鬼门关，哪一道都是进去就出不来，我竟然都冲了过去，浑身的衣服撕得稀烂，一路上就听见大人哭孩子叫的声音，我觉得我命好大呀。

还有人回忆说：白花花的大水一眼望不到边，我在水里不知翻了多少个滚，憋得不行，一露头，见两个大“淤杂”向我冲来，其中有一棵连根拔起的大桐树，上面攀着许多人，乱哭乱叫，有人喊：“抱好东西！抱好东西呀！”

有一个始终被洪水潮头“载”着往下游去的村民，一路东去，速度迅疾，犹如乘车。他说：大水冲毁了坟地，冲出了坟墓里的棺材，我是抱着一块棺材板才活了下来。洪水的水头足有几丈高，我浮在水头上面看前方的人，人就像立在悬崖上，我记得大水冲过一处树梢，树梢下面有一所小院落，我清

楚地看见屋里还亮着灯，有一个小妮子嘴里喊着“奶奶！”正往屋里跑，这时，“轰”地一声就全没有了。

当时文城拖拉机站75马力的链轨拖拉机，被冲到数百米外，许多合抱大树被连根抛起，巨大的石碾子也被举上了浪峰。板桥水库8日凌晨垮坝后，仅一小时，洪水就冲进了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遂平县40万人，此时有半数漂没在水中，一些人被途中的电线、铁丝缠绕勒死，一些人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坠入旋涡淹毙。洪水将京广铁路的钢轨拧成绞丝状，将石油公司的50吨油罐也卷进了宿鸭湖中。

据宿鸭湖水库技术人员回忆：只听“咚！咚！咚”，堤外一座座泡在水里的房屋垮了。上游冲下来的“淤杂儿”和人，挤在水库的进水处，像旋涡一样打着转转。“救人呀！救人呀！”哭喊声成片，眼看着一个个人栽在水里就不见了。

板桥水库垮坝5小时后，库水即泄尽。汝河沿岸，十几个公社、一百多个大队的土地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见冲击。洪水过处，田野上的熟土悉被刮尽，黑土荡然无存，遗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鲜黄色。驻马店地区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基本被淹。

当这场特大暴雨发生时，当地各级领导积极组织广大群众抗洪抢险，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向地势高的地方转移。在板桥，石漫滩等水库垮坝后的第一时间里，人民解放军数万名官兵，以及上级相关部门组建的几十个医疗队，在灾区洪水未退，险象环生，工作和生活条件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不顾身，争分夺秒奔赴灾区救死扶伤，抢修道路桥梁，通讯和电力设施，安抚灾区群众，解决群众吃住等生活问题。非灾区群众闻讯后，也都纷纷自觉蒸馒头，烙大饼，送衣送被交给民政部门统一送往灾区，由解放军和当地政府分发给灾区人民。

在无道路的灾区，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用直升机空投食物、衣被、药物等急需物资给灾区人民。在飞机空投物资的时候，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维持秩序，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

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的口号。等道路抢修完毕后，运送救灾物资的车辆，不分昼夜，从四面八方开往灾区，在地方政府和解放军统一组织下，分发给受灾的群众。由于高效有序的组织领导，使灾区迅速控制了由灾害导致的饥饿、疾病流行、社会动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在灾区群众吃住和情绪基本稳定后，当地政府迅速组织灾区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经过大家的努力，被水毁的河渠等水利工程以及道路、桥梁、通讯、电力等设施均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修复。板桥石漫滩及中小型水毁的水库复建工程，被列入国家和地方重点基本建设项目，选配一流的施工队施工。

复建后的板桥，石漫滩等水库防洪标准，规模，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完全可抗御“75.8”的特大洪水。即使再发生超过“75.8”的特大洪水，亦有科学可靠的预案，可保证水库工程本身安全。

现在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已比“75.8”特大洪水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生活幸福，正和全国人民一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梦奋勇向前。

“75.8”抗洪救灾的历史事实，体现了共产党对人民的关怀和鱼水深情，体现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注：此文部分摘自网络资料，经口述者证明当时确有些事。)

艰苦的年代 纯洁的人

胡跃兰口述 张海芳整理

岁月的长河，载着沧桑、载着历史，汨汨流淌。水清沙白，荡涤出一枚枚贝壳，晶莹剔透。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也折射出时代的印痕。

我叫胡跃兰，出生于1943年，祖籍湖北。出生不久母亲因病去世，留下父亲和我们姐弟三人。父亲因无力养活我们几个，就只好把我和姐姐送给别人抚养了。后来弟弟得了场大病，因家境贫寒无力救治而夭折。姐姐被送到一个农民家庭，后来一直都过得很苦。我命好被送到了一个城市家庭，家境还算不错，养父母待我又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别人有的我从不缺，而且还供我去读书，所以我一直都享受着关爱，在幸福中成长。

初中毕业之后，因缘嫁给了我老公，他当时是一位从朝鲜回国的现役军人。1960年，老公转业到广东海南（当时，海南是广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就一路随他来到海南。当时的海南很落后、很穷困，物资更是严重匮乏。我作为家属被安排到一家国有企业做生产工，也因此见证了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的淳朴。

1960年的中国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其实7分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人祸”，3分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天灾”。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方不顾中方的困难，逼中国还债，所以我们中国人民只能勒紧裤腰带还债。另外为了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国际地位上不孤立，政府号召全国人民省吃俭用，更紧的勒紧腰带，把剩下来的物资去援助朝鲜、越南、非洲等社会主义的“小兄弟”国家，以获取对中国的支持。还有很多省份几个月都看不到雨水，造成旱灾严重、粮食减产。

就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我党1958年又发出“大跃进”运动的号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大肆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困难，也是导致1959年~1961年粮食供给严重困难的直接原因。

那时中国大部分省市，特别是农村家庭所有的粮食都上交充公，当时是盛行“共产风”，印象最深的是吃“食堂”。一到开饭点家家人人都端着盆到食堂打饭，然后全家围在一起吃。

最饥荒的是1961年，那时粮食缺口很大，曾一度以茅根、野菜等各种代食品成为我们的主食，有些人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不管是什么都往嘴里塞，那真是连树叶树皮都吃进去了，那些年真的是很苦，由于吃不饱饭，各地都有很多人得了大肚子病，这种间接因误食而导致死亡的现象时有发生。

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觉悟却很高，不管是否接受过教育，都是一样的觉悟，大家彼此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都会有关爱之心，就算是陌生人也不会冷漠相对。总之，人人都显示出了那种淳朴的高风亮节，整个社会真的是沉浸在一片和谐温馨中。那时大家都奉行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精神，做起事来是争着抢着做最苦最累的工作。到了吃饭时都会礼让他人，宁愿自己吃最差的东西也会把好的让给别人。我当时也不例外，自从进了企业做生产工开始，我不忘提高思想觉悟，不仅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会比别人做得更多更好，但却从不主动索取。单位里分了东西从来不会留给自己，总是让出来给别人。比如，有时候单位会分一些绿豆、小米、布匹之类的东西，即使我自己心里也很想要，而且家里也确实很需要这些东西，但为了表明自己的无私，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东西送给“阶级兄弟姐妹们”。

还有就是穿着方面，当时不管是普通群众还是党员干部，甚至是女人都是穿着统一的黄色、灰色衣服或者旧绿布军装，没有人会穿得花花绿绿，因为穿着太花俏的人不仅会被大家笑话，有时甚至会被当做小资产阶级拉去批斗的。记得我当时从湖北老家特意买了几条非常好看的旗袍，由于在当时来说是过于花俏的，所以一直压在箱底不敢拿出来穿。有时实在禁不住它的诱惑，就会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拿出来穿在身上，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一番，等过足了瘾，再依依不舍地脱下来，放回箱底收好它，现在想想真是傻得好笑。

还有就是官场，那时的官场也不会像现在有什么“潜规则”。能者为官，党员干部们真的是吃苦在前，以身作则、时刻自律，既没有“官味”，也没有“官架子”。即使是一些上层的大干部，下基层视察时，也跟普通工人农民同吃同住，穿着同样是旧军服或普通的那种干部服。贪污腐败、公款吃喝这种现象是更加没有的。

那时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公平公正地进行，完全的透明化。我在企业做生产工时，从来没有想“往上爬”，刻意表现，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本本份份地做人。后来因表现突出，上层领导主动找我谈话，引荐我入团入党，再后来提拔为干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给任何领导送过礼走过关系，一切都顺其自然。

再到后来我做干部时，我也坚守这份清廉，从没送过他人礼，也不曾收受过任何人的好处。而我身边的人，我也从没看到有收受什么贿赂，整个官场都是光明磊落。大家都是一心为党为民不藏私心，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埋没良心或玩弄职权，所以很少有贪官污吏和腐败现象，更没有什么挪用公款、花天酒地的情况。

因为当官的这些“上梁正”，下面的人民群众也就都很遵纪守法。那时社会上没有人聚众赌博、也没有人吸毒卖淫；没有随处可见的弃婴、也没有街头流浪的乞丐；没有到处乱蹿的流氓团伙、也没有可恶的车匪路霸；没有任何抢劫偷盗、也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现象；没有假冒伪劣的商品、也没有唯利是图坑人的商贩。那些败坏人心，影响道德风化的事件很少听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甜美，人心所向的气氛，大家团结一致亲如一家。

在那种饥寒交迫的年代，治安竟然好得让人不可思议。人们白天出门是从不用锁门的，掩上门就出去了，就算出去个几天几夜，回到家里，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没有人会来偷东西，大家都很有自觉。更夸张的是，比如你走在路上看见一堆牛粪，可当时没带工具，于是就在牛粪（可以把它运回家种地当作肥料用）周围画一个圈，证明是有人发现了的，别的人看见后就决不会再去动它了。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稳定无争的社会现象，反映出那时人们的善良和淳朴。

那时老百姓的生活，虽然很清贫、穷苦，但老百姓的心里确实很温暖、很喜悦，也都很满意。我们能够昂起头、挺起胸面对世界各国人民，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美好的向往。我活了这么多年，经历了几代领导人，也就是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最廉洁最动人。

自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确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于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距今已走过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一个个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创造和开发；一个个大型工程得到竣工；一个个超大型企业正在迅速成长。中国真的是强壮



年轻靓丽的主人公

了，不再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积贫积弱。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先进的通讯工具天涯海角都能通话，甚至还可以通过屏幕看到人。而电脑网络就像是一个遍布全球的巨大蜘蛛网，把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甚至每个小家庭都连接到一起，现在的人们真是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啊。

所有的这些改变，都见证着中国惊人的发展速度，但是社会风气与日俱下，在各种物质欲望的熏陶下，一切向前看变成朝“钱”看。于是最初的人性被泯灭了，良知被淹没了，冷酷漠视成了现实，自私自利成了硬道理。我真心希望新一届的领导班子，能在经济和精神方面两手都要抓起来，在提高全国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要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只有人们的精神生活富裕了，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安定团结，那样才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光阴似箭一飞而过，悠悠往事历历如昨。昨日之事虽已成今日之记忆，但抚摸往事我很庆幸，虽然我生在旧社会，但我一路感受着祖国的发展壮大，憧憬未来我自信：中国将更加强大！

知青

知青

陈伟雄口述 陈小玲整理

岁月蹉跎，记忆悠长。翻开历史的一页，打开记忆的闸门，漫长逝去的岁月，几多怀念，几多感慨。几多沧桑，几多波折。知青的岁月，离我们已经很远。但知青的情怀，感染着我们这一代人。

陈伟雄今年62岁，白净的脸上留下了岁月走过的痕迹。他是个很开朗乐观又很正直的人，所以，年过六十，依然一头黑发。一见到我们就滔滔不绝的说个不停。

他60年代毕业于顺德华侨中学，毕业后就被顺德党委挑选进了机关党部工作，之后就被安排前往一些困难农村地区走访。那时他主要是做记录员，总跟着工作组往农村跑，因此他对当时的社会民情比一般人要了解得多，尤其是对于顺德第一批下乡知青更是非常了解。所以他见证了第一批下乡知青的详细情况。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接着，毛主席又发出那个著名的指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此一个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席卷全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开

展起来。广大知识青年奔向农村，奔向边疆，踏上了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

知青为什么叫知青呢？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缩写，而“知识青年”是指受过学校教育，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因为当时城市工业少，就业人口太多，而农村建设严重缺少人才，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填补农村的缺人问题，所以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去支援农村建设。记得当时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按毛主席的指示，1968年末第一批知青下乡，当时整个国家经济都很困难，但是全国人民一致听从党的领导，响应党的号召，各个省市的大批知青积极下乡，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支援农村建设。而各个地方的村民也很乐意接收知青，对知青很是友善。





毛主席语录印在我心上

大部分知青刚下乡时什么都不懂，这些年轻人有很多在家过着较优裕的生活，平时连家务活都不会干，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下乡到农村生活，什么都要靠自己，还要去做农活，这对于知青来讲是个多大的转变啊。光是住宿条件就差得让人受不了，他们住的是当地农民废弃的粮仓，里面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好不容易收拾干净了，一到晚上老鼠串来串去，胆子小些的都被吓哭了。蚊子多到伸手就能抓住，个个的手上腿上全是红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知青们凭着心中的那份信念硬是强忍着、支撑着，无怨无悔地坚守着农村这块阵地。后来领导了解到知青们的艰难，就拨款建了一些房子给知青们住，以便于他们有个更好的安身之所。

白天全都跟着村里的生产队去干农活，等到上手熟悉了，再由农民骨干或是积极份子带着他们干。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都要准时去出工。当时他们正是热血青年、血气方刚，不服输，干起活来谁也不让谁。就这样他们一个个从刚来时的白白净净、弱不禁风，全部变成了黑脸包公。原本白白嫩嫩的手也变得粗糙了，手掌也磨出了老茧子，手指也磨破出了血泡，却没有一人叫苦。

当时顺德知青也是有工资的，他们的工资是跟当地农民挂钩，拿出本地农民十位最高工资的平均点，作为当时知青的工资。所以知青和本地农民都是团结一致，关系非常融洽的。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子女、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但是结了婚的知青就不能返城了。

在顺德，三年后第一批知青开始返城，当时为了争取返城的机会，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例如，结了婚的知青离开了农村的妻子和孩子。

那个年代的知青是无私、无畏、无悔的一代，他们为祖国建设献出了青春年华，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毅然选择了远离父母、远离亲人，投身农村建设。在艰苦的环境下，默默地体验着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间的苍桑。虽然很苦，但也得到了身心的锻炼，他们的心志因此变得更成熟更坚定，人生的阅历也增长很多。所以他们当中的一部份人，后来竟成了各行各业的精英，有些则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那段曾经挥洒的泪水、特殊的人生经历、难忘的蹉跎岁月，将永远地烙在人们的记忆中。

编 后

新

松友邻社工站进驻新松社区后，将探访社区长者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组建妇女探访义工队定期探访。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访后，大家总结出：大部分长者衣食无缺，缺乏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和共鸣。长者，尤其是行动不便的高龄长者，最乐于与他人分享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回忆往事时，他们的面容熠熠生辉，他们的目光如炬，一下子好似回到了年轻时代，那份无法表露的喜悦让人心疼又心酸。现实中，还有多少人可以坐下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其实，长者们丰富的人生阅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印记。年事见长，他们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被倾听、被响应，更希望能给后人一些启发。于是探访义工和社工商定：编撰一本记录长者真实经历的书册，名曰《燃烧的岁月》，让年轻人对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不仅拓宽视野，提高认知水平，而且在情感上，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更加尊重关爱长者。

在社工的积极组织下，6月22日《燃烧的岁月》编委会正式成立。全组共有7位工作人员，分别是：一位统筹（社工）、一位总编、两位修订（编辑和统筹兼任）、六位编辑。除社工和总编外，其他人都是社区普通家庭主妇。编委会成立之后，便开始分工行动，收集素材。社工根据各位编辑的特长，将两人编为一组，一人善于写作，一人善于访谈，两人一起采访，一起讨论撰写稿件。初稿写完之后，交给修订初步修改，修改完之后再由主编数次修改完善，最终定稿。

在访谈的过程中，编委们都能用心去倾听，用心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老人们坚韧积极的生活态度，情感上的朴实和

执着等等，都给大家很大的感触。完全没有写作经验的编辑们就凭着这份感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老人的敬爱，完成了数万字的书稿。

这本书里没有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故事，有的只是平凡的真实，真实的伟大。每一位老人都是一本历史书，这本书饱含着人生的哲理和生活的智慧，希望有更多的人坐下来，用心阅读、用心品味，相信一定会有触动心灵的收获。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只能选取同类素材中的其中一部分，难以全面反映老人们的总体概况，恳请谅解。同时因我们水平和经验有限，本书肯定存在许多瑕疵，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

感谢态度开放乐于分享的长者；

感谢项目组全体成员的辛勤劳动。尤其要感谢的是何总编。何总编认真查阅历史资料，确保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准确，而且能洞察老人的心灵，写出他们的心声。由于何总编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特别感谢何总编。

感谢设计师精心设计；

感谢媒体的大力宣传；

感谢社工局的大力支持；

感谢社工刘楚君、林冠琪、冯雪仪三位同事的协助；

感谢所有对这本书提供过帮助和支持的人。谢谢。

。

编委会统筹：付红霞
2013年12月1日